

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論考*

尹富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雜誌社副編審

摘要

整體而言，中國地藏信仰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從高宗永徽二年（651）開始，到玄宗先天元年（712），這 60 多年是中國地藏信仰發展的第二段，是地藏信仰在中國展開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期。如果說隋及唐初 70 年中，中國地藏信仰表現出以稱念地藏名號為主的特點，那麼，在 7 世紀中葉到 8 世紀初的 62 年中，地藏造像的大量出現應是此期最為顯著的特點。此期的造像不僅在數量上比較多，而且在形制上也十分豐富，為以後地藏造像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本文從地藏造像的興盛及其原因、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及其成因、造像記所反映的信仰狀況三個方面，對此期的地藏造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

* 收稿日期：2008.08.01，通過審查日期：2009.01.17。

【目次】

引言

一、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的興盛及其原因

（一）地藏造像的興盛

（二）地藏造像興盛的原因探析

二、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及其成因

（一）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

（二）地藏造像形制特點的成因

三、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記研究

（一）造像者階層分析

（二）祈願內容研究

關鍵詞：地藏信仰、地藏造像、造像記、《十輪經》、三階教

引言

在中國佛教中，地藏與觀音、文殊、普賢一起被尊為四大菩薩，他以「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¹ 的宏大誓願與自我犧牲精神而著稱，更以「幽冥教主」的身份和神秘的死後世界聯繫起來，從而得到了普遍的崇敬與膜拜，在民眾的信仰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地藏菩薩之名雖然可能早在 3 世紀中葉已傳入中國，但倡導該信仰的經典則是在 6 世紀初以後才在中國出現。² 整體而言，中國地藏信仰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其一，永徽二年（651）玄奘重譯《十輪經》之前，特別是隋及唐初的 70 年，這是地藏信仰在中國的興起期。隨著《大方廣十輪經》、《占察善惡業報經》、《須彌藏經》特別是前兩經的傳播，地藏造像雖然數量少且分佈不廣，但已然出現；稱念地藏名號在當時則是一種較為普遍的信仰行爲。³ 其二，永徽二年至法藏去世的先天元年（712），這是地藏信仰在中國的迅速發展期。其三，先天元年至《地藏菩薩本願經》產生的五代末初（大致在 936-974 年間），⁴ 這是地藏菩薩確定其在中國佛教中特殊地位的時期。地藏幽冥世界的救贖功能得到強調，他成為了幽冥中的主要救贖者，甚至取代了閻羅王的地位而成爲幽冥之主。其四，《地藏菩薩本願經》產生以後，這是地藏信仰中國化進程的完成期。《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出現與傳播，使地藏信仰融入中國孝道文化之中，隨著地藏菩薩十齋日的命名，地藏菩薩誕日這一宗教民俗節日的出現，九華山地藏道場的形成，以及道教對地藏的吸收、三教整合過程中地藏地位的固定，地藏信仰的中國化最終完成。這四個階段在中國地藏信仰的發展中各有其獨特性，本文的討論將集中於第二階段。⁵

1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大正藏》冊 21，第 1320 號，頁 476 下 24-25。

2 相關內容請參看拙文〈地藏菩薩及其信仰傳入中國時代考〉，頁 63-70。

3 具體情況筆者已另撰文〈中國早期地藏信仰狀況論考〉，此不贅述，頁 35-41。

4 關於《地藏菩薩本願經》的產生時代，筆者〈《地藏菩薩本願經》綜考〉一文有較詳細的考察，可參看頁 48-56。

5 關於中國地藏信仰的發展階段，在筆者之前，聶士全《地藏信仰與金地藏研究述

從高宗永徽二年開始，到玄宗先天元年，這 60 多年是中國地藏信仰展開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期。由於玄奘對《十輪經》的重譯，肯定了該經作為地藏信仰經典、以及為《大集經》系列經典的性質，解除了佛教內部一些人對此經的質疑，《十輪經》的地位大大提高，其傳播愈益廣泛，從而為地藏信仰的發展創造了相當好的條件。⁶ 如果說隋及唐初 70 年中，中國地藏信仰表現出以稱念地藏名號為主的特點，那麼，在 7 世紀中葉到 8 世紀初的 62 年中，地藏造像的大量出現應是此期最為顯著的特點。此期的造像不僅在數量上比較多，而且在形制上也十分豐富，為以後地藏造像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本文將從地藏造像的興盛及其原因、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及其成因、造像記所反映的信仰狀況三個方面，對此期的地藏造像作一全面考察。

近些年，隨著石窟考古的不斷推進，石刻資料等不斷公佈，對某一時段的地藏造像進行全面考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目前，關於地藏造像的總體研究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對某一石窟各個時段的地藏造像進行清理與考察；二是在此基礎上對所有地藏造像進行形制特點方面的歸類研究。這兩個層次的研究既有點的深入，也有面的展開，其優點是不言而喻的。且不說臺灣學者潘亮文的《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⁷、大陸學者張總《地藏信仰研究》的第三章「地藏菩薩的造像與繪畫圖像」⁸ 等文，正是以上兩個層次研究相結合的典範，即使是像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⁹，羅華慶〈敦煌地藏圖像和「地藏十王廳」研究〉¹⁰，胡良學、蔣德才〈大足石刻地藏造像初

評》一文曾以「地藏名義及其本源」、「地藏聖德與地藏信仰之特點」、「地藏菩薩與地府信仰」、「金地藏研究概觀」四個部分，對中國地藏信仰的發展史作出了提綱挈領的敘述。在此基礎上，莊明興將中古時期地藏信仰的發展分為三期，即永徽二年玄奘重譯《十輪經》之前為初期，唐代前期與唐代後期，唐代前後期之間並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界限。筆者則綜合考慮了經典的傳譯與闡釋、造像的演變、信仰內容的變化等等做出了以上分期。請參看聶士全，〈地藏信仰與金地藏研究述評〉；莊明興，《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

6 相關情況請參看拙文，〈《十輪經》中土傳播研究〉，頁 148-152。

7 潘亮文，《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頁 1-79。

8 張總，《地藏信仰研究》，第三章「地藏菩薩的造像與繪畫圖像」，頁 173-352。

9 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7-34。

10 羅華慶，〈敦煌地藏圖像和「地藏十王廳」研究〉，頁 5-14。

識》¹¹ 等主要進行第一個層次研究的文章，也努力以第二個層次的研究為歸依。但這兩個層次的研究也是有明顯缺陷的，那就是：二者都傾向於靜態的、共時性的考察，未能將地藏造像與不同階段的社會背景以及經典的流傳情況結合起來，難以更深入地揭示地藏造像及地藏信仰的階段性特徵。本文選取 7 世紀中葉到 8 世紀初的地藏造像進行研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以上不足。

在展開本文的論述前，有必要對第二階段的時間劃分再作一簡要的說明。《十輪經》的重譯在中國地藏信仰發展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並且今存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地藏造像也出現在《十輪經》重譯之後，故以之作爲本階段的時間上限應該不會有異議。至於其下限的確定，主要考慮到以下兩個因素：其一，地藏救贖重心向幽冥世界的偏移及其幽冥中主要救贖者地位的建立更多地發生在先天元年之後。因爲，目前所知第一則地藏在地獄中實施救濟的故事見於法藏《華嚴經傳記》，而該書在法藏先天元年去世時尚未完成。¹² 另外，睿宗景雲二年（711）劉秀撰〈大雲寺碑〉，碑文中提到司馬逸等人於涼州大雲寺所畫地獄變中「觀音菩薩二、地藏一，齊空放光」事。¹³ 此畫的創作時間在武則天勅兩京諸州建大雲寺之後，應是 7 世紀末，這說明隨著佛教幽冥觀念進一步深入中國社會，大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觀音、地藏這類菩薩在幽冥中的救濟作用已經凸現出來，不過地藏作爲幽冥世界的主要救贖者的地位尚未建立。其二，地藏不僅是顯教的菩薩，在密教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以往學者們往往根據一些密教經典，籠統地認爲地藏造像受到了密教的影響，甚至將地藏造像完全歸之於密教。但最早介紹地藏菩薩形像的漢譯密典《不空罽索神變真言

¹¹ 胡良學、蔣德才，〈大足石刻地藏造像初識〉，頁 39-43。

¹² 參看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冊 50，第 2054 號，頁 283 上 7-8。據崔傳，該書後由法藏門人慧苑、慧英續成。另，關於《華嚴經傳記》的作者，崔傳云，《華嚴經傳記》又名《纂靈記》，並引《纂靈記》曰：「西京華嚴寺僧千里撰，藏公別錄」（頁 280 下 25-26），又說《華嚴經傳記》乃法藏「簡二傳而聚異聞，考百祥而騰近說」（頁 283 上 6-7）輯成，這些說法似乎有矛盾。推想其意，我以爲，很可能是僧千里先撰有《纂靈記》，法藏將其與另外一傳記一併甄錄，並補充了一些新的靈驗故事，而慧苑、慧英的續補工作則主要是「別加論贊」，故崔傳評之云「文極省約，所益無幾」，頁 283 上 8。

¹³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 69，頁 1181 上。另見張維，《隴右金石錄》卷 2，頁 15991 下。

經》譯成於唐中宗景龍三年（709），故密教對地藏造像的影響應是盛唐以後的事。¹⁴ 從這一角度看，以先天元年為界，也有利於我們考察地藏造像的階段性特徵。

一、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的興盛及其原因

（一）地藏造像的興盛

在拙文〈中國早期的地藏信仰狀況考論〉中，我曾指出，道宣《續高僧傳·闍提斯那傳》中所提到的隋文帝時陝州樹地藏菩薩一事很可能確有其事，但從該傳中可以看出，當時地藏造像流行的地域是很窄的，而且其數量恐怕也很有限。但從 7 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地藏造像無論是在流行地域還是在造像數量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顯示出地藏菩薩在人們的信仰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目前所知最早有確切紀年的地藏菩薩造像是在今河北省隆堯縣的宣務山，宣務山又名堯山，相傳為堯的封邑。宣務山石窟開鑿於隋代，其中有 1 龕造於高宗龍朔年間（661-663）的地藏菩薩像，為比丘尼真□□所造，其造像記云：

龍朔□年□月十五日，比丘尼真□□□地藏菩薩。¹⁵

此條造像記以前被與開元廿□年的造像記合錄在一起，因而不被人們重視，但無論從造像時間還是造像人來看，顯然是兩條造像記，而非一條。另外，宣務山還有 1 龕造於上元元年的地藏像，為齊大雅等 3 人所造，由於高宗與肅宗都有上元年號，故此龕地藏的造像年代既可能是 674 年，也有可能是

¹⁴ 詳說見後文。

¹⁵ 見張稼農，〈隆堯縣宣務山文物古跡介紹〉，頁 56。我將此期地藏造像及造像記分別製成了兩個附錄，以下介紹各石窟造像的具體情況，均請參看本書附錄一及附錄二，如無特別需要，不再一一出注。

760年。據介紹，宣務山的石窟本有739龕，想必其中還應有一些地藏像，可惜「十年浩劫」之後，所有造像均已蕩然無存，¹⁶以上兩龕地藏的具體形態，我們也不得而知了。

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是目前所知保存早期地藏造像最多的石窟。該石窟中有確切紀年的最早的地藏像是由定州安喜縣□丞張君實所造，時間是在高宗麟德元年（664），具體地點在藥方洞外。據常青先生考察，此龕地藏像可能還不是龍門最早的地藏雕刻，賓陽南洞李□靜造有一菩薩形立地藏像，雖然沒有標明年代，但其形體特徵與賓陽南洞東壁貞觀二十一年（647）洛州嵩陽縣令慕容氏造彌陀像龕，以及貞觀十□年洛陽宮留守閻武蓋造像龕中的立菩薩像基本一致，因而該地藏像的時代有可能早至貞觀末年或永徽（650-655）年間。¹⁷除這兩龕像外，龍門石窟還有12龕至少15軀有確切紀年表明是造於7世紀中葉至8世紀初的地藏像，分別是：高宗乾封二年（667）□德子造地藏像，總章二年（669）法藏尚等造地藏1軀，咸亨四年（673）牛懿德造地藏1軀，上元二年（675）造彌陀、觀音、地藏各1軀，永隆元年（680）胡處貞造地藏2軀，永隆二年（681）胡處貞造地藏2軀，垂拱三年（687）路敬潛妻盧氏造地藏1軀，長壽二年（693）任智滿造彌陀、地藏、觀音像，長安四年（704）造彌陀、地藏像，神龍三年（707）前後比丘尼恩恩造地藏2軀，景雲元年（710）造觀音、地藏各1軀，景雲二年（711）造彌陀、地藏、觀音像。除這些有確切紀年者外，還有9軀也基本可以肯定是造於武則天時代（690-705），分別是：溫玉造地藏1軀，普光造地藏2軀，□□光子造地藏1軀，清信女賈造地藏1軀，甘大娘造觀音、地藏各1軀，楊婆造地藏1軀，樹提伽造地藏菩薩1軀，佚名造地藏菩薩1軀。這9軀地藏的造像記中雖然沒有確切紀年，但其中「地藏」均刻作「塞藏」，用的是武周新字。另外，溫玉成先生推定，李去泰所造彌陀、觀音、地藏像應在乾封、總章間（666-669）¹⁸；王婆上元三年

¹⁶ 關於宣務山的龕窟及保存情況，請參看〈隆堯縣文物古跡——宣務山石窟〉，2006.08.11，http://www.he.xinhuanet.com/zfwq/2006-08/11/content_7755325_4.htm。

¹⁷ 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29-30。

¹⁸ 溫玉成，〈洛陽龍門雙窟〉，頁125-127。李去泰所造阿彌陀、觀音、地藏龕的標號為前148，它在雙窟小龕分期中屬第一期，該期造像時間在乾封、總章間。但溫

（676）曾造有觀音像，她造地藏像的時間也應在此前後；¹⁹ 而僧知道為入遼兄造像從內容來看，可能也屬高宗時期。²⁰

龍門地區的唐代造像，主要盛行於初盛唐，「安史之亂」後漸漸式微。在我依據諸書所收集的龍門石窟唐代地藏造像記中，尚有 20 條（包括兩條可能重複的目錄）無年代線索，但它們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屬於 7 世紀中葉至 8 世紀初這一時間範圍。此外，據常青先生介紹，龍門石窟中還保存了大量的無紀年的左、右舒地藏菩薩像，多位於西山的北段與中段，它們的造型特徵也多屬唐高宗與武則天年間；還有 4 軀沙門形地藏也屬於這一時期。²¹ 因此，自 7 世紀中葉至 8 世紀初，龍門地區地藏造像可以說是相當興盛的。

比龍門稍後出現有確切紀年的地藏造像的，有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及河北邯鄲響堂山石窟。

彬縣為古豳州的州治，大佛寺石窟開創於貞觀二年（628）。目前我們所知的有確切紀年或基本知道紀年的地藏造像有 6 龕 10 軀，都在睿宗延和元年（712）之前。分別是：比丘神智長壽二年（693）造地藏 1 軀，李承基長壽三年（694）造地藏 1 軀，元思叡證聖元年（695）造地藏 1 軀，雲景嘉證聖元年造地藏 1 軀，元海元會等人證聖元年前後造地藏 4 軀，高叔夏聖曆元年（698）造地藏 2 軀。²² 另外，千佛洞窟室西壁 Q69 號龕中脅侍藥師佛的半跏

先生所據的該龕造像記不全，其前尚有「□□四年正月」字樣，而乾封、總章均只有 3 年，則此龕造像的具體時間尚有再議之處。不過，根據溫先生對雙窯小龕的考察，將此龕定為高宗時所造大致是不差的。

¹⁹ 陸增祥即將兩個造像記列在一起，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31，頁 206 下。

²⁰ 陸增祥認為可能是貞觀年間征遼時造，但高宗永徽六年（655）、顯慶三年（658）、顯慶四年（659）屢次與高麗發生戰爭，顯慶五年（660）及龍朔元年（661），更派大軍征討高麗、百濟，故我認為，此造像記更可能屬於高宗時期。參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33，頁 220 中；《資治通鑒》卷 199、卷 200，頁 6287-6288、6309、6319。

²¹ 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30。

²² 比丘神智造像記中對造像內容無明確說明，李承基造像記中僅云「敬造出家菩薩」，但二者所造應是地藏菩薩。常青先生曾對李承基造像記中的「出家菩薩」進行過比較審慎的考證：一方面，他指出，佛典中釋迦在出家之前，被稱為菩薩，從北朝時期的造像情況看，菩薩裝的半跏趺坐像也一般為釋迦牟尼在家時的形像，但此龕像為佛裝，因此還不能將它比定為剛出家時的釋迦牟尼。另一方面，

趺坐菩薩也應當是地藏菩薩，該龕雕刻於景龍二年（708）。再者，據常青先生《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一書的描述，彬縣大佛寺石窟千佛洞中還有 23 龕 27 軀半跏趺坐的菩薩，他認為這些佛裝的菩薩也可能是表現地藏的。²³ 張總先生對此表示了肯定，並進一步認為這些地藏像基本上都造於 7 世紀末期。²⁴ 我也同意這一看法。

響堂山石窟中有確切紀年的地藏造像有 8 龕約 8 軀，其中有 7 龕符合我們討論的時間範圍，分別是：□娘、男元琰證聖元年（695）造地藏 1 軀，王大貞及妻聖曆二年（699）造彌勒、觀音、地藏像，為亡妻陳長安□年（701-704）造觀音、地藏像，荊義振等神龍元年（705）造地藏、觀音像，黃□貞景龍二年（708）造地藏、觀音像，吳四娘景龍四年（710）造地藏、觀音、大世主菩薩像，荊□□等先天元年（712）造地藏、觀音像。²⁵ 除這幾龕有造像記者外，臺灣學者潘亮文指出有 4 龕也屬於觀音、地藏組合像，²⁶ 其造像時間大致也在本節的討論範圍之內。

廣元石窟中僅有 1 龕有確切紀年的地藏造像，即比丘僧廣行天寶十五載（755）造觀音、地藏各 1 軀，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但據雷玉華、王劍平等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冊 36 中，有一幅〈僧行□移立尊勝幢記〉拓片（頁 58），該拓片中除後唐清泰三年（936）僧行□移立尊勝幢的題記之外，還很有可能早於清泰三年的韓思順母侯氏等題名，在題名的上方，有與其字跡一樣的「……父母造出家地藏菩薩」句，將地藏菩薩稱為出家菩薩。因此，常青指出，李承基所造的出家菩薩也極可能是地藏菩薩，見《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235-236。其實，我發現，李承基造像記前半部分是根據《大方廣十輪經》的序品撰寫的（詳說見下文），故其中的出家菩薩確鑿無疑應是地藏菩薩。比丘神智造像與李承基造像外形完全一樣，動作也相同，僅是方向相反，則該像也必然是地藏菩薩。

- 23 這些龕的龕號、具體位置及它們在《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中的出處，請參看本書附錄一。常青對這些龕像的定性見《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第三章「大佛寺石窟造像的時代風格」，頁 235。
- 24 張總，《地藏信仰研究》，頁 178-182。
- 25 該龕的造像時間為「先天元年四月四日」，但據《舊唐書·睿宗紀》，景雲三年（712）正月改元為太極，五月又改元為延和，八月傳位玄宗，改元為先天。故這條題記很可能是改元先天之後補刻的。頁 158、160。
- 26 見潘亮文，《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頁 19-20。

先生考察，在廣元千佛崖、觀音岩遺存的 51 龕地藏造像中，有 10 龕大約是雕造於武周時期。²⁷ 四川通江縣千佛崖第 29 號龕中的一左舒坐地藏可能也雕造於高宗時期。²⁸

同樣，敦煌莫高窟也沒有確切紀年屬於此期的造像。不過，潘亮文指出，莫高窟第 372 窟東壁門南所畫地藏菩薩為初唐時的作品，²⁹ 王惠民同意這一說法，並指出第 333 窟東壁門南和門北原被稱為弟子的兩畫像也應是地藏菩薩。³⁰ 據《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介紹，第 372 及第 333 窟雖均修建於初唐，但前者宋、清之時，後者五代及清都曾重修，³¹ 且第 333 窟兩地藏的面部、手部及部分袈裟五代時均重描過，³² 故我認為這三幅地藏像的繪製時間，也可能並不一定是在初唐，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姑且納入此期討論。

除以上諸石窟之外，我在清人陸耀燾《金石續編》卷 5 中找到一則造像記，³³ 該造像記表明，唐高宗永隆二年（681），雍州好畤縣（今陝西乾縣）佛弟子張三娘曾為亡夫及父、婆、男女眷屬，造彌勒、觀音、地藏及鑄般若多心經。臺灣學人莊明興也提到中宗景龍二年（708）的一則造像拓片（傳拓 T675.2.4462），其中有云造地藏、觀音各 1 軀。³⁴ 但這兩尊造像地點不詳，拓片我也未能得睹，故難以詳論。另外，咸亨元年（670）崔善德夫婦也造有彌勒並地藏像碑，不過，由於該碑碑側有五代後梁貞明二年（916）的重刊題名，加之碑陰地藏像風格較圓轉，故一些學者認為它很可能是後代補刻的。³⁵

27 雷玉華、王劍平，《廣元石窟》，頁 132-135。

28 參見丁明夷，〈川北石窟筭記——從廣元到巴中〉，頁 44。該地藏身體兩側各化出一道祥雲，雲端各坐五像，丁先生認為表現的是地藏十王，恐非是。我認為該像應表現的是地藏與十佛。

29 潘亮文，《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頁 23-24。

30 王惠民，〈唐前期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21。

31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頁 122、135。

32 王惠民，〈唐前期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22。

33 〔清〕陸耀燾，《金石續編》卷 5，頁 3107。

34 莊明興，《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頁 181。

35 李靜傑，《石佛選粹》，頁 70。

我也贊同這一意見。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7世紀半到8世紀初，60多年的時間裏，地藏造像在洛陽、長安附近及其周邊的石窟中是十分流行的。以龍門石窟為例，此期（651-712）可確知年代的地藏造像雖遠不及觀音，但卻大大地超過了其他菩薩，³⁶ 地藏已成為佛教造像中的重要題材。

（二）地藏造像興盛的原因探析

雖然隋初地藏信仰在中土已然興起，而且根據文獻的記載，在隋文帝仁壽二年左右已有地藏造像出現，但在隋及唐初的70年中，地藏造像並沒有出現興盛的局面，何以7世紀中葉以後，地藏造像會大量出現呢？對這一問題，學術界雖然已注意到了《十輪經》的重譯與地藏造像之間的因果關係，但一方面，地藏造像的興盛是由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十輪經》的重譯或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但卻並非全部原因；另一方面，就新譯《十輪經》對地藏造像的影響而論，以往人們也更多地是將注意力放在對地藏形像的影響上，³⁷ 缺乏更為全面的分析與細緻深入的解說。因此，在本小節中，我將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地藏造像的興盛，首先與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佛教在唐代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地位提高的情況下，佛教造像的大規模出現密切相關。

西元589年，隋王朝經過一系列戰爭最後統一中國，結束了歷時4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楊堅（581-604年在位）在其20多年的統治中，使在歷次

³⁶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根據852個有確切紀年的造像目錄所編製的造像編年表顯示，此期觀音造像有48龕（包括觀音菩薩與救苦觀音），地藏有11龕（根據我所收集到的資料統計，應為20龕至少23軀），而勢至菩薩僅2龕，大惠菩薩僅1龕，「二菩薩像」（內容不明，有可能是文殊普賢，也有可能是觀音勢至，還有可能是觀音地藏）也不過15龕。參看《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目錄〉，頁450-453。

³⁷ 例如，莊明興認為：「沙門形地藏造像在初唐時期，很可能受到新譯本《十輪經》出現的影響，逐漸地開始在龍門石窟、響堂山石窟中出現。」見《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頁92。

戰爭中屢遭破壞的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但這種局面僅持續了很短暫的時間，煬帝即位之後，內修運河，屢次巡幸江都，外用兵於高麗，費帑無數，加上隨之而來的隋末動亂，使剛剛恢復生氣的社會經濟再次遭受沉重打擊。唐立國後，經武德、貞觀前後 32 年的統治，特別是因為唐太宗的勵精圖治，一度緊張的國內矛盾大大緩解，對突厥戰爭的勝利也解除了外部的威脅，唐王朝之統治基礎大為鞏固，這為經濟的繁榮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高宗繼位後，由於有大批太宗舊臣的輔佐，以及精明幹練的武氏的協助，這種穩定的形勢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高宗武后統治的 50 多年時間裏，雖然在國內政治及外部事務中也受到一些挑戰，但整個社會在總體上是比較平穩的，社會經濟也持續穩步地發展。

在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佛教在唐代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作為第一大宗教的地位也得以確立。我們知道，在唐初的 30 多年中，佛教受到了來自儒士及道教徒相當激烈的攻擊，太史令傅奕、太子中舍人辛諤都曾上疏亟言佛法害國，必欲去之而後快，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秦世英諸人又從而助之。加之李唐王室奉老子為元祖，故高祖太宗都對佛教採取了抑制政策。這種抑制主要表現為：在三教關係上崇儒家而輕釋道，先道後佛；在具體措施上則多次沙汰僧尼、檢校佛法，太宗甚至將護法高僧法琳下獄按問，流放蜀部。直到太宗晚年，因為憂生之慮以及玄奘法師的影響，才比較留心佛法。自 7 世紀中葉高宗繼位開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高宗及其二子中宗、睿宗均崇信佛法，高宗不僅優禮玄奘，而且還有迎佛骨於大內供養之舉；中宗也常幸佛寺及設齋，並大造佛寺；睿宗則詔僧道每緣法集，齊行進集。當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則天武后。由於在攫取權力直至踐履大寶的過程中，佛教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加上打擊李唐宗室的需要，武后採取了崇佛抑道的政策，其主要表現為：詔令僧尼居道士及女冠前，敕天下斷屠釣者 8 年，斂天下僧錢作大像，獎崇譯經等等。³⁸ 總之，到玄宗即位的 8 世紀初，佛教在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享有了很高的地位，佛教作為第一大宗教的地位已相當穩固。

³⁸ 有關玄宗以前唐代各位君主與佛教的關係，請參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頁 10-18、22-26。

社會經濟的繁榮，為佛教造像的興盛創造出了物質的條件，而佛教在唐代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第一大宗教地位的確立則為其提供了內在原因。因此，比之隋文帝至唐太宗的 69 年（581-649），高宗至睿宗的 63 年裏，佛教造像呈現出相當程度的繁榮景象。以龍門石窟為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曾廣泛搜集了各種金石著作及方志中的記載，編成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龍門石刻錄的目錄，並根據其中 852 個有確切紀年的石刻錄編製了造像編年表。通過該編年表，我們可以看到，始鑿於北魏孝文帝時的龍門石窟，在西元 495 年至 712 年的兩百多年中，僅 650 年至 712 年所雕造的龕像即達 490 個，占總數的 57.5% 以上，相反，從 581 年至 649 年，所雕造的龕像僅 65 個，二者之間的差距是相當大的。³⁹ 雖然龍門石窟的龕像相當多，有確切紀年者僅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以上對比應該大致上反映了其總體情況。另外，只要稍加瀏覽收錄各種造像記比較齊全的《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書，我們也會發現，初唐後 63 年的造像是遠多於此前的 69 年的。

在整個社會佛教造像十分興盛的情況下，已有相當信仰基礎的地藏菩薩造像出現興盛的局面，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其次，《十輪經》的重譯及廣泛傳播，是地藏造像興盛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十輪經》是倡導地藏信仰的重要經典，經中不但多次宣揚地藏於五濁惡世救濟眾生的宏大誓願，還反覆讚歎地藏菩薩的修為功德，申說其信仰的種種利益，甚至將其信仰利益凌駕於彌勒、文殊、觀世音、普賢等菩薩之上。

《大方廣十輪經》是《十輪經》的第一個中土譯本，其翻譯時代大致在 6 世紀初以後，隋建國之前。在隋及唐初的 70 年中（581-651），三階教是《大方廣十輪經》的主要傳播者。據矢吹慶輝先生的統計，三階教最主要的典籍——《三階佛法》所引用的佛教經典中，《大方廣十輪經》的引用次數最多，達到 120 次，比排名第二位的《涅槃經》的引用次數足足多了 33 次。⁴⁰ 在三階教

³⁹ 參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目錄〉，頁 450-453。

⁴⁰ 參見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頁 595。

主要典籍中，完全不引用《大方廣十輪經》章節的極為少見。⁴¹ 而據我檢索，與之相對的是，隋及唐初中土其他僧人的著述中，幾乎沒有人提及《十輪經》及其相關內容。因此，在新譯《十輪經》出現之前，作為《大方廣十輪經》的主要傳播者，三階教人對於造像的態度顯然會影響到地藏造像的展開。

南北朝時代，由於統治者的提倡，佛教造像頗為興盛。湯用彤先生曾概括北朝佛教的特徵云：「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饒益。故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力，為北朝佛法之特徵。」⁴²《辯正論》載隋文帝時「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許軀」⁴³，其中絕大多數肯定都是在南北朝時期鑄造的。造像的蜂起為佛教在民衆中的普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也滋生出了很多流弊，包括：造像數量急劇膨脹，製作水準參差不齊、粗製濫造，出現造像商品化趨勢，以及興造之徒不守禁戒等等。⁴⁴ 這些弊端，自然會引起佛教僧團中有識之士的重視，產生於6世紀的《像法決疑經》即體現了糾正造像中各種弊端的努力。該經借佛之口，嚴禁各種形式的買賣造像，並對造像水準低劣者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值得注意的是，該經雖然不反對建造新像，但卻更鼓勵信徒修治舊像：

復有眾生見他舊寺塔廟形像及以經典破落毀壞不肯修治，便作是言：「非我先崇所造，何用治為？我寧更自造立新者。」善男子，一切眾生造立新者，不如修故其福甚多。⁴⁵

復次應治破壞塔廟及諸形像，莫問已許他許，隨其力能一切皆治，其人功德不可思議，但能修故不假造新。⁴⁶

《像法決疑經》雖然被隋法經、彥琮等人撰寫的兩種《衆經目錄》列為疑

41 同前注，頁 644。

42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362。

43 法琳，《辯正論》卷 3，《大正藏》冊 52，第 2110 號，頁 509 中 9-10。

44 相關論述請參看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衆佛教信仰》，頁 279-283。

45 《像法決疑經》，《大正藏》冊 85，第 2870 號，頁 1336 上 15-19。

46 同前注，頁 1337 中 24-27。

偽經，⁴⁷ 但它卻被許多高僧大德所引用，而且有隋一代的造像活動也顯示出該經影響的痕跡。比如《辯正論》載隋文帝時新造的佛像「大小一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這僅及所修治故像的十五分之一左右；煬帝時修治故像 101000 軀，鑄刻新像 3850 軀，二者的差距也很大。⁴⁸

然而，在隋唐的佛教宗派中，三階教與《像法決疑經》的關係最為密切。唐中宗時，三階教僧人師利曾在《像法決疑經》的基礎上，雜合玄奘所譯《法住經》及不空所譯《百千頌大集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偽造成《瑜伽法鏡經》⁴⁹，顯示出三階教與《像法決疑經》的關係不同一般。但事實上，早在三階教的創始人信行的著作中，《像法決疑經》就曾多次被徵引。據矢吹慶輝先生考察，日本所傳的《三階佛法》4 卷中引《像法決疑經》18 次，敦煌出土的《對根起行法》引該經 4 次，二者之和在他所列的 39 種三階教所依經典中列第 9 位，可見信行對該經的重視。⁵⁰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三階佛法》卷 2 在闡述第 24 段普真普正佛法時，正引述了上面「修故勝新」的觀點：

廿四者，明得頓不滅。從無始世界乃至未得法忍已來，修治自他一切破像、一切破經、一切破寺等，勝作一切新經寺。皆悉普得不滅故，如《像法決疑經》與多部經義同。⁵¹

這第 24 段普真普正佛法是三階教教義之根本。智顛、吉藏，以及唐代的窺基等許多高僧大德，在他們的著作中也曾多處徵引過《像法決疑經》，但據我考察，除類書性質的《法苑珠林》及《諸經要集》之外，都未涉及過「修故

⁴⁷ 法經等撰，《衆經目錄》卷 2，《大正藏》冊 55，第 2146 號，頁 126 中 13；彥琮等撰，《衆經目錄》卷 4，《大正藏》冊 55，第 2147 號，頁 172 下 4。

⁴⁸ 《辯正論》卷 3，《大正藏》冊 52，第 2110 號，頁 509 中 8-9，頁 509 下 11-12。

⁴⁹ 對於此經的偽造情況，智昇有清楚的交待，見《開元釋教錄》卷 18，《大正藏》冊 55，第 2154 號，頁 672 中 29-下 14。

⁵⁰ 矢吹先生將三階教所引經典列成一表，見《三階教之研究》，頁 595-597。關於三階教與《像法決疑經》之關係，矢吹先生在其大著中多次論及，並闢有「像法決疑經と三階教」專節。請參看《三階教之研究》，頁 566、667-675。

⁵¹ 見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別篇》，頁 23（303）。

勝新」的觀點，信行卻將之置於本派的根本教義之中，則該觀點對三階教人的影響顯然是其他教派無法比擬的。

當然，三階教人對建寺造像雖持「修故勝新」的觀點，但他們對建造新像也不全然排斥，信行《人集錄依諸大乘經中略發願法》中就有「爲一切衆生作佛像轉經」之願。⁵² 不過，該願與基本教義比起來，其影響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階教在造像問題上不僅持「修故勝新」的觀點，而且對具體的形像也不是那麼看重。三階教提倡「觀像」，如《晝夜六時發願法》中說：「六時禮拜佛法大綱，晝三夜三各嚴香花，入塔觀像，供養行道。……觀此七階佛如在目前，思惟如來所有功德，應作如是清淨懺悔。」⁵³ 但不同根機的人觀行是不同的，信行所著《制法》有云：

又佛滅度後凡夫、惡時惡世界衆生，根機不同，或上或次或最下下。根既差別，觀行亦異。上根者，得在靜室端坐，閉目用心，作無相三昧觀。……用心觀佛過去真身。……次根者，亦得在靜室端坐，閉目用心，觀現在形像佛從少至多。……最下下根者，得行，唯得立，唯得舉頭開目，用眼觀現在形像佛，不得低頭，不得閉目。⁵⁴

可見三階教的「觀像」，最提倡閉目用心，觀過去佛之真身，而舉頭開目，用眼觀現在形像佛，只是最下下根機者的觀法。所謂「觀此七階佛如在目前」正是指用心觀而不是用眼觀。

正如信行本人雖然認爲當時已進入第三階，但他自己卻是「一乘菩薩」一樣，恐怕一般三階教徒也不會安心於「最下下根者」，他們對上根者用心而不

⁵² 敦煌寫本北 8422（重 22）號，見黃永武編，《敦煌寶藏》冊 110，頁 272 下。

⁵³ 同前注，頁 272 下。

⁵⁴ 西本照真，《三階教之研究》，頁 582-583，原文見敦煌寫本 P2849。據《開元錄》，《制法》之全名爲《大衆制法》，共 1 卷。見《開元釋教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4 號，頁 678 下 11。

是用眼來「觀像」的追求，很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對具體的佛菩薩像的態度。故雖然信行本人對具體的佛菩薩像是很重視的，⁵⁵ 但其他三階教人則很難說，《念佛鏡》中就曾攻擊三階教說：

三階法中，見形像及以諸經，不多恭敬，為是泥龕。四生眾生是真佛故，所以恭敬。⁵⁶

這一攻擊雖然可能有過火之處，但大抵可以說明三階教與經像間的關係。

隋及唐初，地藏信仰方興未艾，三階教人對造像的上述態度，無疑會對地藏造像產生重要影響，因為隋前幾乎就沒有地藏造像可供修治，至於新造他們當然也不會全力以赴。正如我在〈中國早期地藏信仰狀況論考〉一文中所指出的，隋及唐初即使有地藏造像的話，數量少，且分佈範圍不廣，很可能就是它在今天難覓蹤跡的重要原因。而這一情況的出現，三階教人恐怕難脫關係。但是，隨著玄奘新譯《十輪經》的出現，《十輪經》的地位大大提高，三階教之外其他各宗派的許多高僧大德開始重視此經，他們的引用和闡釋，使此經突破了三階教的藩籬，得到愈益廣泛的傳播，⁵⁷ 地藏菩薩的各種功德也就會被愈來愈多的人們所熟知，這必然會對整個社會的信仰生活產生重要影響。就造像而論，對更為廣大的信眾、甚至普通的三階教教徒來說，「修故勝新」的觀點不會再有多大的約束力，在造像仍是表達信仰的重要方式的情況下，地藏造像

⁵⁵ 《續高僧傳·信行傳》就說他「隨遠近處，凡有影塔，皆周行禮拜，遶旋翹仰，因為來世敬佛之習。……末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臥視至卒。」《大正藏》冊 50，第 2060 號，頁 560 上 6-23。另外，從這一記載來看，信行似乎是行「最下下根者」的觀像法。

⁵⁶ 沙門道鏡、善道共集，《念佛鏡》，《大正藏》冊 47，第 1966 號，頁 127 上 25-27。

⁵⁷ 關於《十輪經》重譯之後高僧大德的引用及闡釋情況，請參閱拙文〈《十輪經》中土傳播研究〉，頁 150-152。遺憾的是，原稿中曾將引用情況列為一表，但正式發表時因版面原因而被刪除。這些引用與闡釋總是極力調和《十輪經》與其他一些大乘經典的矛盾，特別是淨土宗大德懷感在解決《十輪經》中「造十惡輪罪，一切諸佛不救」與淨土宗所倡導的念佛罪滅得生西方觀念之間的衝突時，還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三階教教主信行，指責他在對《十輪經》的闡釋上「執文迷義」。

在此時期的興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⁵⁸

再次，地藏像放光靈驗故事的流傳，對地藏造像的興盛，起了更為直接的作用。

《法苑珠林》卷 14 載有益州法聚寺張僧繇所畫地藏像放光一事，其文云：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畫地藏菩薩，卻坐繩牀垂腳，高八九寸。本像是張僧繇畫。至麟德二年（665）七月，當寺僧圖得一本，放光乍出乍沒，如似金環，大同本光。如是展轉圖寫，出者類皆放光。當年八月，敕追一本，入宮供養。現今京城內外道俗畫者供養，並皆放光。信知佛力，不可測量。（家別一本，不別引記）。⁵⁹

該故事發生在麟德二年（665）七月。而宋僧常謹所集《地藏菩薩像靈驗記》中，另外有一則張僧繇在漢州善寂寺所畫觀音、地藏像放光事，發生於麟德元年（664），⁶⁰ 而目前我們所知石窟遺跡中有確切紀年的地藏造像也是在麟德之後才逐漸多起來的。以上時間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說常謹所收漢

⁵⁸ 由於《念佛鏡》及《西方要決釋疑通規》中說三階教稱念地藏甚至專稱地藏菩薩，故此前學者們往往將地藏造像與三階教聯繫起來。丁明夷〈龍門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與類型〉一文雖未明言，但實際上是把龍門早期的地藏造像歸之於三階教的。而溫玉成更將龍門等石窟造像中地藏題材的流行，歸功於三階教之深入民間。常青也持同樣看法。但一方面，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三階教人與地藏信仰的關係可能並不如淨土宗人所說那麼密切；另一方面，當時的地藏信仰已成爲一種普遍的社會信仰，非爲三階教所獨專，因此這一看法值得商榷。當然，在此時期大規模的造像活動中，作為地藏信仰的早期倡導者、《十輪經》的早期傳播者，三階教人也必然會加入其中，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他民眾的造像，只是，我們顯然不宜將此期地藏造像的興盛全部或主要歸功於三階教。參看丁明夷，〈龍門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與類型〉，頁 544；溫玉成，〈洛陽龍門雙窟〉，頁 127-128；常青，〈龍門石窟「北市彩帛行淨土堂」〉，頁 72；〈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32；拙著，〈論三階教與地藏信仰——兼論淨土教對地藏信仰的吸收與排斥〉，頁 137-142。

⁵⁹ 〔唐〕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 14，頁 488。

⁶⁰ 〔宋〕常謹，《地藏菩薩像靈驗記》，《續藏經》冊 149，頁 354。

州善寂寺地藏放光靈驗記，有可能是後人從《法苑珠林》改竄而出，不是很可信的話，⁶¹ 那麼，《法苑珠林》的完成時間是在總章元年（668），⁶² 與麟德二年僅相去 3 年，它所記載的靈驗故事對地藏造像的影響情況應該有相當的可信度。據道世說，麟德二年八月，該地藏像即被「敕追一本，入宮供養」，到他記載此事時，「京城內外道俗」畫地藏像供養已非常普遍。可見該靈驗記對地藏造像的影響是很大的。這種影響當然也會延續到石窟造像之中，雖然道世在記載中對此沒有明確說明，但我以為，如今石窟遺跡中所顯示的 7 世紀以後地藏造像興盛局面的出現，該靈驗故事的產生及流傳，應當起了更為直接的作用。

二、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及其成因

（一）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

從石窟遺跡來看，7 世紀中葉至 8 世紀初的地藏造像不僅在數量上很豐富，而且在形制上也相當有特點，為以後的造像奠定了基礎。這些地藏像就每龕的情況而論，既有單尊的，也有雙尊的，還有與其他佛菩薩組合的樣式；以身體姿態而論，有左右舒坐（半跏趺坐）的，也有站立式的；就服飾與面貌特徵而言，有佛像裝、菩薩裝、沙門形；⁶³ 就手上動作看，有單手托珠或執蓮

⁶¹ 該畫像的摹本在北宋英宗時曾被重新發現，北宋末年還引起了一場大的信仰風潮。但惠洪在〈放光二大士贊〉一文中認為，該畫中雲間跏趺的僧形人物應是觀音與大勢至，並非觀音與地藏。見《石門文字禪》卷 18，頁 190 其說是。

⁶² 李儼，〈法苑珠林序〉云：「故於大唐總章元年，歲在執徐，律惟姑洗，三月三十日纂集斯畢。」見《法苑珠林校注》卷首，頁 2。

⁶³ 從服飾與面貌特徵方面所做的區分，以前僅菩薩裝（或菩薩形）與沙門形、披帽形三類。常青在對彬縣大佛寺石窟進行調查時，發現了身著佛裝、頭有肉髻一類地藏像，並將之命名為佛像裝。張總在其著作中接受了這一說法，並將地藏造像分為佛像裝、菩薩裝與沙門形、披帽形四類，其中披帽形出現時代較晚，大致在晚唐五代之時。本文亦對這一分類加以援用。請參看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

蕾，雙手托珠，一手提瓶、一手結印，以及手發線光聯結五道或六道，種種樣式。在本小節中，我將以服飾與面貌特徵為主要分類標準，結合其他分類，對此期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作一簡單的介紹。⁶⁴

1. 菩薩裝地藏

菩薩裝地藏主要出現於龍門石窟，是於今所知的最早的地藏造像樣式。該樣式的基本服飾特徵是：頭束髮髻，頸飾項圈，帔帛繞肩，袒身著裙，與這一時期雕造的其他菩薩像沒有多少差別。這些地藏像，大多採取左、右舒坐式，例如，賓陽南洞牛懿德所造的地藏菩薩（圖 1），坐於圓形座上，右足交於座上，左足下舒踏覆蓮圓足踏，左手撫左膝上，右手彎曲上揚。這是左舒坐式。也有右舒坐式的，例如淨土堂景雲元年所造觀音、地藏像中的地藏菩薩即作右舒坐式。彎曲上揚的手中往往都托有物品，如景雲元年所造觀音、地藏中的地藏，上揚的左手中托的瓶，而該窟外北壁北 1 龕內西壁的地藏菩薩上揚的左手執的是寶珠，牛懿德所造地藏像右手以上以前應該也有物品。

龍門石窟菩薩裝地藏，也有一些是立像，例如賓陽南洞李□靜造地藏像（圖 2），該像身軀直立，體態略顯臃腫，帔帛在腹下交叉，左手下提一瓶，右手作拈花狀，頭部飾有頭巾，分披於雙肩部位。此為單尊地藏，而更多的立像則出現於與其他佛菩薩組合的樣式中，例如普泰洞外上元二年（675）造彌陀、觀音、地藏，蔡大娘洞比丘尼九娘造彌陀、觀音、地藏，惠簡洞清信女賈造七佛及地藏等等組合像中，地藏均為立像。這種情況不只見於龍門石窟，南響堂第 6 洞王大貞及妻聖曆二年（699）所造彌勒、觀音、地藏的組合龕中，

術》，頁 167、235；張總，《地藏信仰研究》，頁 293-304。

⁶⁴ 關於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本文附錄一所引諸書及文章，大都根據實地觀測有一定的描述。而對地藏造像的總體研究則主要有：羅世平，〈地藏十王圖像的遺存及其信仰〉，頁 373-414；潘亮文，《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頁 1-79；李淞，《長安藝術與宗教文明》中論及地藏圖像的部分，頁 203-209；以及張總，《地藏信仰研究》，頁 173-352。由於有這些成果在前，因而我只打算對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作一簡略介紹，並將主要的筆墨用於對這些造像所涉及的相關問題的探討上。另，我在作形制特點的介紹時，往往要參照相關諸種著述，擇善而從，實難一一指明出處，只好在這裏就資料來源作一些總的說明，敬希見諒。

地藏亦為瓔珞裝飾的立像，與其他菩薩沒有兩樣。

2. 佛像裝地藏

在 7 世紀半至 8 世紀初的地藏造像中，佛像裝地藏是近年才發現的一種樣式，主要出現於陝西彬縣的大佛寺石窟，而其他石窟中此期尚未發現有該樣式。這些地藏的衣飾有的是袒裸右肩式的袈裟，有的披雙領下垂式大衣，有的著通肩大衣，全是佛陀所著的服裝。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藏像頭部的特點，雖然他們的頭部大多殘損，但仔細觀察，卻可以從一些作品的遺跡中發現原有的肉髻。例如，千佛洞中 Q163 號龕的地藏（圖 3）頭部偏大，面相豐滿，五官已殘，而頭頂的大肉髻卻仍然十分明顯。同樣，Q130 號龕中地藏（圖 4）頭頂的肉髻也非常明顯，另外，Q59、Q118、Q131 等龕的地藏似都有肉髻。

大佛寺石窟中的地藏菩薩，基本上都採取左、右舒相坐，有些是以單尊像出現，如 Q14、Q23、Q24、Q25 等等；有些是以雙尊像的形式出現的，如 Q19、Q65、Q115、Q118 等等，Q123 的 6 尊地藏也都以兩兩相對的形式出現，這些雙尊像中的地藏形貌、動作等均相似，只是方向相反。在手上動作上，大佛寺舒相坐的地藏菩薩與龍門同類型的地藏有所不同，舒腿側的手臂既有彎曲上揚執物的，也有橫放於胸前或腹部的，還有雙手疊放於胸前的，其中以橫放胸前者為多；而呈跏趺狀腿側的手或置於腹前，或橫放胸前，或撫該側之膝。這些手形使大佛寺的地藏在整體上比龍門的舒相坐地藏顯得更為雄健一些。⁶⁵

3. 沙門形地藏

此期沙門形地藏有確切紀年者都在響堂山石窟，南響堂第 3 洞中證聖元年（695）□娘、男元琰的造像記中明確地說造的是沙門形地藏。⁶⁶ 該地藏著右袒袈裟，有圓形背光，右手外揚，半跏趺坐，足下踏圓蓮座，由於不見圖片，

⁶⁵ 以上關於彬縣大佛寺地藏造像的形貌特徵的介紹主要來自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更詳細的情況請讀者參看該書。

⁶⁶ 參見附錄二。

不知頭部沙門形狀貌是否保存完好。⁶⁷ 不過，為亡妻陳長安□年（701-704）造觀音、地藏像（圖 5），荊義振等神龍元年（705）造地藏、觀音像（圖 6），這兩龕中的地藏沙門形特徵如今還是比較突出的。此外，彬縣大佛寺石窟 Q123 李承基長壽三年（694）所造佛裝半跏趺坐出家菩薩像其實也是地藏像，「出家菩薩」的稱呼很讓人懷疑此像的形制為沙門形，可惜的是，該像的頭部毀損很嚴重，已無法加以辨認了（圖 7）。

以上這些沙門形地藏都是舒相坐，廣元石窟中也有 7 龕共 8 軀大約雕造於武周時期的舒坐沙門形地藏。⁶⁸ 這 8 軀地藏或著交領袈裟，或著袒右袈裟，均作僧貌。以千佛崖第 535 附 2 號龕中的地藏為例，該地藏左舒坐於須彌座上，面相豐圓，頸 3 道紋，著袒右袈裟，不出衣紋，左足踏圓仰蓮足踏，左手托物外揚，右手托珠反置膝上。此外，據常青先生介紹，龍門石窟迄今為止僅發現有 4 軀沙門形地藏，這些地藏均屬高宗至武則天時期雕刻，其中的 3 軀都是左舒坐，右手上都托有寶珠。

除舒坐像外，此期沙門形地藏中也有五尊立像。敦煌莫高窟有三尊，據王惠民先生介紹，第 333 窟東壁門南的地藏右手胸前持寶珠，左手胸前執說法印；門北的地藏則左手胸前持寶珠，寶珠光中有二佛，右手胸前執說法印，似有兩相對襯之意。第 372 窟東壁門南的地藏頭上有華蓋，雙手平舉胸兩側，手心各有一放光寶珠，光至華蓋上方變為寶雲，雲中有十佛。另一尊在廣元千佛崖第 576 號龕，龕中雕觀音、地藏各一，地藏有圓形頭光，面相長圓，著交領袈裟，左肩繫搭膊，左手下垂體側，握寶珠，右手側舉似托寶珠。還有一尊在龍門石窟賓陽中洞上方（圖 8），該地藏也有圓形頭光，身著通肩式袈裟，腕部飾釧，足下踏有仰覆蓮臺，左臂下垂，右臂彎曲斜舉。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上

⁶⁷ 目前關於該地藏像的描述，僅見袁虹〈南響堂山石窟唐代小龕初探〉一文，該文在介紹此像時，將其所在龕的龕號誤為 3-29，但從文中表四「紀年龕登記表」來看，應是 3-39 之地藏龕無疑。頁 96。

⁶⁸ 雷玉華、王劍平在《廣元石窟》一書中還提到兩龕可能造於高宗或武周時代的舒相坐沙門形地藏，即千佛崖第 726 號附 17 與附 31 號龕。二位先生所作的時代判斷主要依據造像風格，但我發現，這兩尊地藏像受密教經典的影響較大，其造出時間最早都應該在中宗時，更可能是在盛唐時期。相關討論見後文。

揚的右手，從手心處向斜上方引出了 5 條陰刻線，線間浮雕出飛天、合掌直立的人物、奔馬、跪狀人物等，這顯然表現的是六道輪迴。我們知道，地藏與六道輪迴是地藏造像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題材，此龕像應該是其早期形式。

另外，崔善德夫婦造像碑中的左舒坐沙門形地藏與六道輪迴結合在一起，該像左右兩手分別捧一摩尼珠，珠中各發一縷雲頭，分作 3 枝，分刻人物或動物，由兩側對稱交彙於龕頂，每側雲頭刻像 5，從上到下，分別為天道（左上）、阿修羅道（右上）、人道（左中）、餓鬼道（右中）、畜生道（右下）、地獄道（左下）。前面我們說過，該碑上的題記雖然顯示它是咸亨元年（670）所造，但碑側又有五代後梁貞明二年的重刊題名，因此有學者認為碑上的地藏是後來補刻的，從該碑中地藏六道像的成熟程度看，我比較贊同這一看法。

4. 地藏與其他佛菩薩的組合像⁶⁹

從本文的附錄一可以看出，在 7 世紀半至 8 世紀初，單尊或雙尊的地藏占據了主流，與其他佛菩薩的組合像並不多。在所有組合像中，以與觀音組合的情況最多，其中又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僅與觀音組合，有 6 龕，如上面提到的南響堂第 1 洞、第 4 洞中的觀音、地藏組合龕，龍門淨土堂景雲元年（710）所造觀音、地藏龕；二是還與其他佛或菩薩組合，如龍門普泰洞外上元二年（675）所造彌陀、觀音、地藏龕，張三娘永隆二年（681）所造彌勒、觀音、地藏龕，彬縣大佛寺 Q69 號藥師佛、觀音、地藏龕，南響堂第 2 洞吳四娘所造觀音、地藏、大勢至龕等等。此外，在龍門龍華寺外還有地藏與業道的組合，惠簡洞有地藏與七佛的組合，四川通江縣千佛崖第 29 號龕、莫高窟第 372 窟還有地藏與十佛的組合。

以上我從服飾及面貌特徵，並聯繫其他分類標準，對石窟等遺跡中目前已知或基本確定為 7 世紀中葉至 8 世紀初的地藏造像進行了簡略的介紹。從這一介紹可以看出，不同地區的地藏造像雖然在服飾及面貌特徵方面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總的來說地區差異是比較明顯的，這說明此期在對地藏的形貌的認識

⁶⁹ 本文所探討的組合像，主要是指同時或時間相距不遠，有意識地在同一龕或相鄰龕中雕造成組合的形像。

上並沒有形成統一。就數量而論，菩薩形地藏是最多的，佛像裝地藏次之，而沙門形地藏則相對較少；從分佈區域來看，則沙門形地藏要寬一些。另外，在身體姿態方面，左、右舒相坐地藏在本期的造像遺跡中占了絕大多數，而立像則相對較少。從所在龕窟的情況看，以單尊或雙尊地藏為多，與其他佛菩薩的組合則相對較少，而在組合像中，地藏與觀音的關係最為密切。

（二）地藏造像形制特點的成因

某種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往往有賴於相關經典的傳播，因而，經典中對該佛、菩薩形像的描述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造像的形制特點，而且，隨著人們對經典認識的深入，這種影響會越來越大。那麼，7 世紀中葉至 8 世紀初地藏造像的形制特點受到了哪些經典的影響呢？

有學者推測，此期一些地藏造像，可能受到了早期密教的影響，⁷⁰ 這種推測恐怕是錯誤的。因為，目前藏經中確知譯者姓名、最早提及地藏形像的密教經典是菩提流志所譯《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該經始譯於中宗神龍三年（707），譯成於景龍三年（709）。⁷¹ 至於譯者不詳的《佛說地藏菩薩陀羅尼經》⁷²，第一，在唐代及之前的諸藏錄中並無半點蛛絲馬跡，第二，它明顯是從《大方廣十輪經》中抄錄出來的，因此，即使它是一部流傳於當時民間的經典，其功績也應算在《十輪經》頭上。排除密教經典後，影響此期地藏造像形制的經典只能是新、舊譯《十輪經》、《占察善惡業報經》，以及《須彌藏經》，當然，其中最為主要的，應當是《十輪經》。

首先，沙門形地藏菩薩非常明顯地受到了《十輪經》的影響。《大方廣十

⁷⁰ 例如，常青曾根據「沙門形地藏，多為密典所規定」，推想「龍門的四例沙門形地藏，可能與盛唐開元三大士來華以前的早期密教信仰有一些關聯。」見〈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32。

⁷¹ 《開元釋教錄》卷 9，《大正藏》冊 55，第 2154 號，頁 569 中 22-23。另，該經中提到的地藏形像是「左手執蓮花臺上寶印；右手揚掌，半加趺坐」，並沒有說是沙門形。參看《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 9，《大正藏》冊 20，第 1092 號，頁 270 下 28-29。

⁷² 《佛說地藏菩薩陀羅尼經》，《大正藏》冊 20，第 1159B 號，頁 655 中-660 上。

輪經》中說：「是地藏菩薩作沙門像」⁷³，《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說地藏菩薩「並諸眷屬作聲聞像」⁷⁴，這顯然是沙門形地藏的直接根據。該類地藏手上所握的寶珠即如意珠（又稱摩尼珠），在新、舊譯《十輪經》中也有相關描述。例如，《大方廣十輪經》在描述地藏到佉羅堤耶山時，衆比丘及菩薩：「又復皆悉見其兩手有如意珠，兩如意寶，其如意寶各出光明。如是光中皆見十方恒沙世界一切諸佛。……若有病者蒙光觸身，眾病除愈；一切繫縛及應死者，光觸身故皆得解脫；若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光觸身時，悉除三惡。」⁷⁵該如意珠具有除惡受樂等種種功能，當然也會作為一個重要的信仰內容而被雕造出來。而龍門石窟中沙門形地藏與五道的造像則更有可能來自新譯《十輪經》。新譯中有云：「衆生五趣身，諸苦所逼切，歸敬地藏者，有苦悉皆除。」⁷⁶「五趣」為新譯所獨用，舊譯均將之譯為「六道」或「六趣」。

其次，菩薩形地藏及佛像裝地藏也主要受到了《十輪經》的影響。一方面，《占察經》自開皇十三年（593）被禁止流傳外，直到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才被欽定編入正錄。⁷⁷雖然隋末唐初社會動蕩，對該經的禁令並不一定執行得那麼嚴格，但該經的影響力究竟會遭到較大的削弱。《須彌藏經》雖然一直在流傳，但該經提倡地藏信仰的內容並不多，也不見有人將其在大眾中弘傳，所以，它對地藏信仰的影響也是很小的。而《十輪經》則不同，先有三階教的大力宏揚，後又有玄奘的新譯問世後諸宗派的重視與傳播，因此，它對地藏造像的影響力是其他兩部經典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在《占察經》及《須彌藏經》中，對地藏的形像並沒有特別的說明，但在《十輪經》中，指出了地藏菩薩的多種化身：

73 《大方廣十輪經》卷1，《大正藏》冊13，第410號，頁681下14。

74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1，《大正藏》冊13，第411號，頁721下20。

75 《大方廣十輪經》卷1，《大正藏》冊13，第410號，頁681上27-中14。

76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1，《大正藏》冊13，第411號，頁727下19-20。

77 有關該經被禁及被編入正錄的情況請參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12，《大正藏》冊49，第2034號，頁106下8-23；明佺等撰，《大週刊定衆經目錄》卷1、卷11，《大正藏》冊55，第2153號，頁379上23-25，頁442中1-10。

或時現作大梵王身，為諸有情如應說法。或復現作大自在天身，或作欲界他化自在天身，或作樂變化天身，或作睹史多天身，或作夜摩天身，或作帝釋天身，或作四大王天身，或作佛身，或作菩薩身，或作獨覺身，或作聲聞身……。⁷⁸

從這裏可以看出，菩薩形地藏及佛像裝地藏的經典根據顯然也是《十輪經》。⁷⁹

再次，地藏造像受《十輪經》的影響，也可以在造像記中找到佐證。彬縣大佛寺石窟 Q123 號龕中李承基長壽三年（694）造像記云：

夫以提耶妙說，法聲應而降魔；／如意寶珠，神光觸而除惡。
由是／百千菩薩，俱乘稽首之尊；八十／頻婆，會集歸依之聖。
故得天花／遍滿，大雨飛騰。淨有儼其稱揚，／渴仰恭其讚歎。
司馬李承基，誠／心法印，願庇慈雲，是用抽捨淨／財，敬造出家菩薩。
雕形作像，／感德巍巍，畫綵端容，莊嚴□□。伏／願三明具足，四果迴流，長依成／熟之緣，永證無生之恩。
／大周長壽三年，歲次甲午，四月／八日，中大夫行幽州司馬弟子／李承基敬造。⁸⁰

⁷⁸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 1，頁 725 下 16-21。

⁷⁹ 值得注意的是，地藏雖能化為佛身，但在宣揚其信仰的諸經中，他畢竟還是未入涅槃的大悲闡提。而在于闡三藏提雲般若於永昌元年（689）所譯出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中，地藏與觀音、曼殊室利、虛空藏等與會菩薩一起，都被稱為示現菩薩形的「十佛刹極微等諸佛」。見《大正藏》冊 10，第 300 號，頁 905 中 14-18。因為有確切紀年的佛裝形地藏都出於其後，該經是否對佛裝形地藏的產生有影響，值得討論，但它的出現至少說明，佛裝形地藏能為當時的人們理解和接受。該經後來還被實叉難陀於武周久視元年（700）重譯，題名為《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大正藏》冊 10，第 301 號，頁 909 上-912 上。

⁸⁰ 此造像記據〔清〕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2（頁 16947）及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50-151）錄出，標點為筆者所加，文字上擇善而從，詳細校記請參看附錄二。另，本節後文所引造像記均在附錄二中有詳細出處及校記，為節省篇幅，將不再一一出注，請讀者自行參看。

稍加對比，我們即可發現，此則造像記的前半部分完全是從《大方廣十輪經》之〈序品〉化出：提耶，即佉羅堤耶山，《十輪經》正是在此處講說；淨有，即淨有帝釋（玄奘譯本作無垢生），他曾稱揚地藏將至佉羅堤耶山時的種種神跡，並向佛陀請教其原因；渴仰，即渴仰菩薩（玄奘譯本作好疑問），他曾向佛請教地藏的功德及來歷；其他天花遍滿，大雨飛騰，法聲降魔，如意神光等等，都是地藏前來與八十頻婆那由他百千億等大菩薩一起禮佛聽法時的瑞應景象。

李承基造像的時間在彬縣大佛寺石窟的地藏造像中算是比較早的，它對該地後來的造像顯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另外，在大佛寺石窟的一些造像記中，往往將對佛陀的讚美語放在前面，如〈元思叡造像記〉：「夫日容含晬，卅相之殊姿；月面流光，八十種之奇狀。故能獨高天上，稱妙覺而為尊；孤標峯前，顯能仁以居大。昭慧燈於冥隧，運慈棧於迷津。……」⁸¹ 這或許是此處造地藏基本上為佛像裝的一個原因。

除經典的影響外，以往的造像傳統對地藏的形制特點也有相當大的影響。相對其他佛菩薩信仰而言，地藏信仰較為晚起。一方面，由於他主要「護持震旦」⁸²，迄今為止，在印度、中亞我們都沒有發現可資借鑒的 8 世紀之前的造像範本，故地藏的形制可能完全出自中國僧人與工匠們對經典的理解與創造；另一方面，南北朝時期，中國的佛教造像已相當興盛，以觀音、彌勒、彌陀、釋迦佛為代表的佛菩薩造像數量眾多，且工匠們已積累了相當多的藝術經驗，這些造像的形制特點與藝術經驗，必然會給地藏造像特別是早期的造像提供相當多的借鑒。

之前的造像傳統對地藏形制特點的影響首先突出地表現在菩薩形地藏上。龍門石窟中李□靜所造的地藏菩薩，在外形上與觀音菩薩十分相似，特別是左手上提的瓶（景雲元年所造地藏上揚的左手中托的也是瓶），是觀音造像中常用的法器。而上文中所介紹過的其他菩薩形立像，如果不是造像記中明確地說是地藏菩薩，恐怕是很難確定其身份的，因為他們與其他菩薩像實在沒有區

81 〔清〕葉昌熾，《邠州石室錄》卷 1，頁 10944。

82 法琳，《辯正論》卷 5，《大正藏》冊 52，第 2110 號，頁 524 下 12。

別。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本期地藏造像中，最能體現地藏特點的沙門形不但數量較少而且時代也較為晚出的原因。

同樣，左、右舒相坐（半跏趺坐）姿很可能也是早期造像影響的結果。有學者將《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所說地藏菩薩「從定起已，遍於十方諸佛國土，成熟一切所化有情」⁸³，作為半跏趺坐地藏造像出現的原因，雖然有一定道理，但為什麼從定起的菩薩就應是半跏趺坐的而不是其他樣式的？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說明。⁸⁴ 值得注意的是，北朝時期，釋迦牟尼在家時的形像多被雕造為半跏趺坐的菩薩像，⁸⁵ 彌勒菩薩也有半跏趺坐的造像出現。⁸⁶ 半跏趺坐的地藏是否是從這些造像脫化而出呢？這是很有可能的。此期地藏造像中，半跏趺坐像占了大多數，而所謂益州法聚寺張僧繇畫地藏像正是「坐繩床垂腳」的姿態，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我認為，不管這個靈驗故事中的畫像是否是張僧繇所畫，它很可能本來並不是表現地藏的，正如漢州善寂寺所畫觀音、地藏二大士放光靈驗記中的二大士本為觀音、大勢至一樣。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採取之前僅釋迦牟尼及彌勒為菩薩時所特有的半跏趺坐姿，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地藏的「前佛既往，後佛未興」的末法時代的特殊地位。

最後，我們再來探討一下組合像形成的原因。溫玉成先生曾從世俗信仰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指出：「這種不依經典、衝破宗教儀軌束縛而根據施主需要自由組合佛教形像的作法，從唐高宗晚期以來，大有發展的趨勢，多出現於小型龕像中，這乃是世俗信仰的一種表現。」他並將這種情況稱之為世俗信仰的「綜合性」。⁸⁷ 這種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此期地藏與其他佛菩薩的組合像的成因，無疑是正確的，但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這些組合雖然頗為自

⁸³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 1，《大正藏》冊 13，第 411 號，頁 724 中 1-2。

⁸⁴ 莊明興，《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頁 88。

⁸⁵ 例如，龍門石窟蓮花洞南側壁龕中的兩幅佛傳浮雕，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中的半跏思維菩薩像，雲岡石窟第 9、第 10 窟中的樹下思維菩薩像等。參看龍門石窟研究所，《龍門石窟雕刻萃編——佛》，圖版三、四；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頁 89-90。

⁸⁶ 例如，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北齊天保十年（559）「高海亮造像碑」中，彌勒即為半跏趺坐像。參看王景荃，〈試論北朝佛教造像碑〉，頁 42。

⁸⁷ 溫玉成，〈洛陽龍門雙窯〉，頁 127。

由，還是有一定的時代及經典背景的。比如，觀音信仰自南北朝以來十分興盛，而《十輪經》中描述的地藏的救濟範圍與觀音差不多，且功德更勝觀音。因此，當時信眾很可能正是通過觀音來認識和理解地藏的。⁸⁸ 這樣，在信仰心理上，人們更容易將二者並列崇拜，以追求疊加的效果。而從法琳的《辯正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唐太宗時期，人們已將觀音、地藏相提並論，⁸⁹ 這種思想體現在造像中，當然會有觀音與地藏的組合龕出現了。

同樣，地藏與彌勒、觀音，與彌陀、觀音或與藥師佛的組合，也不僅僅是因為世俗信仰的雜糅而致，而是有著經典的基礎——宣傳地藏信仰的《十輪經》、《占察經》等不但不排斥淨土信仰，相反地還竭力融入其中，⁹⁰ 這自然會從造像上反映出來。而經典中有關稱念供養地藏能獲得醫藥、除癒眾病的表述，很可能是地藏與藥師佛的組合的又一基礎。另外，從唐初的信仰情況來看，《釋迦方志》告訴我們，在玄奘重譯《十輪經》之前，稱念觀音、地藏、彌勒、彌陀已經相當普遍，⁹¹ 從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出發，在造像中形成彌勒、觀音、地藏的組合或彌陀、觀音、地藏的組合，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至於地藏與七佛、十佛及業道的組合，可以放在一起討論。據溫玉成的實地考察，業道像是單體小佛，「其形像是：小佛結跏趺坐於蓮座上，禪定印，著雙領下垂袈裟」⁹²。在龍門石窟的造像記中，業道像是較為普遍的名稱，也

⁸⁸ 李□靜所造的地藏菩薩在外形上與觀音菩薩十分相似就是一個明證。

⁸⁹ 例如《辯正論》卷 5 有云：「觀音普現色身，惠覃遐劫；地藏護持震旦，化洽無窮。」卷 7 儒生的詰難：「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貴益眼前。何為念地藏而無徵，喚觀音而不救？」見《大正藏》冊 52，第 2110 號，頁 524 下 11-12、頁 537 中 8-9。

⁹⁰ 具體情況請參看拙文，〈論三階教與地藏信仰——兼論淨土教對地藏信仰的吸收與排斥〉，頁 143。

⁹¹ 道宣，《釋迦方志》卷下，〈通局篇第六〉，頁 109。

⁹² 溫玉成，〈洛陽龍門雙窟〉，頁 120。常青認為業道是「佛教中監視人善惡作業的神祇，也是人們為求得離開苦境而供養的神」，這一解釋與造像的實際情況似不符。但他指出造地藏、業道組合像的作用「似旨在與地藏相配合，以免使亡者輪迴於六趣」則無疑是有道理的。參看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33。

有徑稱業道佛的。⁹³ 所造業道像多者有 50 軀，少者僅 1 軀，但大多為 7 軀或 10 軀，龍門龍華寺外的地藏、業道組合中的業道也是 7 軀。而前述通江千佛崖第 29 號龕、莫高窟第 372 窟地藏與十佛的組合像中，十佛正是單體小佛，想必龍門惠簡洞地藏與七佛組合中的七佛也應如此。

自北魏始，即有釋迦佛與七佛的組合造像出現，⁹⁴ 七佛是指包括釋迦牟尼在內的「過去七佛」，地藏與七佛的組合應來源於此，但其中亦蘊含了《十輪經》與《占察經》關於地藏於五濁末世無佛世界的特殊地位與救度功能的強調。而十佛，則可能是指十方佛，將地藏與十方佛結合起來，可能亦是出於對其救度功能的強調。《十輪經》中就說地藏菩薩兩手中有如意寶，「其如意寶各出光明，如是光中皆見十方恆沙世界一切諸佛，是諸佛所各有菩薩而自圍遶。其光明中盡見十方諸佛世界，若有病者蒙光觸身眾病除愈……。」⁹⁵ 又說地藏「隨佛國土入智明三昧，亦能令彼一切眾生悉離愚癡，便見十方一切佛國。」⁹⁶ 值得注意的是，三階教經典《七階佛名經》中在普誦「如來妙色身」之後，即有念誦十方佛、過去七佛、五十三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等內容，⁹⁷ 或許地藏與七佛、十佛的組合像也與三階教有關，只不過這種關係的大小，似不宜做過度的闡釋。⁹⁸

⁹³ 如〈龍門石刻錄·錄文〉中第 23 號「唐夏侯造業道像記」，第 60 號「清信田婆等造業道像記」，第 212 號「李桃樹母造業道像記」，第 302 號「成大娘造救苦菩薩業道像記」，第 309 號「王仁則造業道像記」，第 310 號「李大娘造業道像記」，第 889 號「唐比丘元杲造業道像記」等等，均稱業道像；但第 308 號「祝三兒造業道佛記」中則稱「敬造／業道佛十／區」。分別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50、252、266、272、273、350。

⁹⁴ 〈龍門石刻錄·錄文〉第 984 號，北魏正始五年（507）史市榮即曾造「釋迦像一區，並七佛」；第 632 號，熙平二年（517）比丘惠珍亦曾造釋迦並七佛。分別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358、306。

⁹⁵ 《大方廣十輪經》，《大正藏》冊 13，第 410 號，頁 681 上 28-中 3。

⁹⁶ 同前注，頁 683 中 11-12。

⁹⁷ 見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別篇》，頁 3（179）。該經中三次提到十方佛，第一次是「南無東方須彌燈光明如來十方佛等一切諸佛」，第二次是「南無東方善德如來十方佛等一切諸佛」，第三次列出了全部十方佛名，但東方佛為阿閼佛。

⁹⁸ 在三階教經典中，《七階佛名經》的流傳相當廣泛。據廣川堯敏統計，敦煌寫本中內容與《七階佛名經》相關的高達一百多件，而智昇《集諸經禮懺儀》卷上亦保

三、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記研究

上面我們介紹了 7 世紀中葉到 8 世紀初地藏造像的興盛情況及形制特點，那麼，在當時佛教造像較為普遍、較為興盛的情況下，參與地藏造像的是哪些階層的人呢？他們造像的目的或者所祈願的內容有哪些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對地藏造像記進行研究。我所收集到的歷代地藏造像記中，有 40 條有明確紀年或從用字等方面可以推定是屬於 7 世紀中葉到 8 世紀初。這些造像記主要集中在龍門、彬縣大佛寺及響堂山石窟中，其中龍門 26 條，彬縣大佛寺 6 條，響堂山 6 條，宣務山 1 條，造像碑 1 條。此外，龍門石窟中沒有年代線索的 20 條造像記，其中大多也應屬於此時期。為此，除可能造於開元五年（717）之後的 1 條，以及 5 條一般性的目錄外，其餘 14 條造像記我將全部歸入此時期予以論述，只是在使用上，讓其更多地居於輔助說明的地位。

（一）造像者階層分析

從造像記看，此期參與地藏造像的有三類人，其一是僧尼，其二是官員及其家屬，其三是一般民衆。在 40 條造像記中，僧尼造像有 7 條，⁹⁹ 所占比例

存了兩篇《七階佛名經》。這些眾多的寫本與傳本中，有一些在禮五十三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之外，也禮拜諸大菩薩。我注意到，觀音、文殊、普賢等出現得較多，個別敦煌寫本中也有地藏菩薩，例如北 8342（麗 39），但他是與觀世音、大勢至、藥王、藥上、虛空藏等菩薩一起出現的，並沒有表現出特別之處。另外，龍門石窟中有一則顯慶元年（656）的造像記，其文云：「大唐顯慶元年，歲在景／□，□□月十五日，佛弟子／□□□□□□□□／敬造優填王像□□，／竝五十三佛、廿五佛、卅／五佛、七佛、十六（案：當作方）佛。願亡／□遊神淨刹，□無生忍，／願法界含靈，俱登正覺。」（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龍門石刻錄·錄文〉第 8 號，頁 248）該造像非常明顯地受到了《七階佛名經》的影響，但在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地藏造像或造像記中，我們還沒有找到任何一個類似的例子。以上事實也說明關於三階教與地藏信仰之關係，的確有深入考察的必要。廣川堯敏的研究轉引自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頁 115-117。

⁹⁹ 比丘尼恩恩所造兩軀地藏分別是為亡父及亡母所造，時間也不同，一為某年「七月廿日成」，一為某年某「月七日成」，本應分為兩條造像記，但歷來金石著作均將它們與神龍三年（707）尼恩恩造業道像合在一起，本文亦遵從之。

為 17.5%；官員及其家屬造像有 9 條，所占比例約為 22.5%；平民造像 24 條，所占比例約為 60%。在龍門石窟另外 14 條無年代線索的造像記中，僧尼造像有 5 條，其餘均為平民所造。

僧尼、官員及其家屬的信仰活動往往對一般民衆有引領作用，特別是名僧及高級官員的引領作用更為突出，但所有參與地藏造像的僧人中，沒有一個比較知名的，參與造像的官員品階也不高。我們試對官員的造像情況作一分析。龍門衆多的地藏造像中僅有兩龕地藏像為官員所造。他們是：定州安喜縣丞張君實，將作監丞牛懿德。張君實的情況已不可考，牛懿德此前還做過東台主書，他於麟德二年（664-665）及乾封元年（666）還造過兩次佛像，前一次造像內容不詳，後一次造的是阿彌陀佛。¹⁰⁰ 安喜縣丞的品階為從八品上，¹⁰¹ 將作監丞為從六品下，¹⁰² 都不太高。彬縣大佛寺石窟中官員造像的情況較多一些，我所收集到的該地 6 個地藏造像記，有 5 個都是當地官員留下的。這些官員包括：中大夫行豳州司馬李承基、宣德郎行豳州司戶參軍事元思叡、朝議郎行豳州司戶參軍事雲景嘉、朝散郎行豳州司法參軍元海、通直郎行豳州參軍事元會、給事郎行豳州新平縣丞高叔夏。豳州為上州，¹⁰³ 以上官職品階最高的司馬為從五品下階，其他官職都在七品以後。¹⁰⁴ 也就是說，參與地藏造像的主要是中下層官員。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雖然《法苑珠林》中記載放光的地藏像曾被迎入皇宮中供養，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發現一例由皇室成員（包括李氏及

¹⁰⁰ 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目錄〉，頁 389，第 478、第 490 號。

¹⁰¹ 據《舊唐書》卷 39，〈地理志二〉，定州為上州，安喜縣為州治所在地，應該是上縣；又據《舊唐書》卷 42，〈職官志一〉，諸州上縣丞為從第八品上階。頁 1510-1511、1800。

¹⁰² 見《舊唐書》卷 44，〈職官志三〉，頁 1896。

¹⁰³ 見《舊唐書》卷 38，〈地理志一〉，頁 1040。

¹⁰⁴ 據《舊唐書》卷 44，〈職官志三〉：「上州……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三人，從九品上。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並從七品下。參軍事四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頁 1917-1918。

武氏)所造的地藏。因此,準確地說,此期石窟地藏造像,主要流行於中下層官員、一般僧尼及平民中,至於皇室成員、高級官吏及高層僧侶在內的社會上層階級在造像方面似乎是不大熱心的。

(二) 祈願內容研究

地藏造像記中的祈願內容,不僅記述了造像者的渴望與追求,而且有助於我們分析信眾對地藏信仰的接受與理解程度,從而更爲全面地把握地藏信仰在中土的發展脈絡。但以往有關地藏造像的研究,大多將精力主要用於對形制特點的考察上,而對造像記則以過錄爲主,缺乏深入的分析與考察。¹⁰⁵近年來,臺灣學人莊明興首先注意了這一問題,在其著作中對地藏造像記進行了一些探討,但他當時所依據的資料主要是龍門石窟及響堂山石窟的造像記,且蒐集弗全,彬縣大佛寺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造像記則完全未曾注意。¹⁰⁶因此,在較爲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地藏造像記的基礎上,我們來對7世紀中葉至8世紀初地藏造像記中的祈願內容再作一番探討。

首先,希望成佛是地藏造像記中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在40條造像記中,有13條直接表達了這樣的祈願,不過它們在表述上又分爲以下幾種情況:

1. 成佛,僅一條,在響堂山石窟:

神龍元年四一月□,荊義振爲……敬/造地藏菩薩,女大娘敬造觀世音/菩薩,上爲則天□□/……/……下及/師僧父母、七世先亡、見眷/屬,同時成佛。

2. 登正覺、登正果或登佛果,有8條。其中響堂山石窟4條:

¹⁰⁵ 例如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一文,根據實地調查過錄了34條地藏造像記,但對造像記本身則未作深入分析。

¹⁰⁶ 參見莊明興,《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頁98-106。

大周證聖元年，歲次乙未，十月乙亥朔廿二日景申，佛弟子／
□娘、男元琰謂亡夫高禮澄敬造沙門地藏菩／薩□鋪。上爲聖
母皇帝，下爲七代亡過父母，見存／□府福貴（？）莊嚴法界
蒼生，俱登正覺。

大周聖曆二年九月廿日，滏陽縣飢山鄉人王大貞及妻高，上爲
神皇師僧，／下見存父母，闔家無災難，／七代先亡，群生淨
土，敬造／彌勒像、觀音菩薩、耑藏菩薩供養。普共一切含
生，俱發無上道心，摠□□覺。

景龍四年二月十日，弟子／吳四娘爲父母敬造地藏／菩薩、觀
世音菩薩、大世主菩薩，上爲天皇天后，自爲／□□□，闔家
大小，俱登正／覺。

先天元年四月四日，佛弟／子荊□□二女郭件／娘，敬造地藏
菩薩、觀世／音菩薩二軀，上爲聖神皇帝、七世先亡、師僧父
母，／俱越□□，□登覺道。

龍門石窟 3 條：

……／……／娘……／……／……／……彌陀佛……／……地
藏／……軀觀／音菩薩一區。普爲師僧父／母及一切衆生，／
常得安樂，元諸／永離苦，願俱登／正果。景雲二年八月八日
／造成。

弟子甘大娘奉／爲二親及以自身，／敬造觀世音菩／薩、耑藏
菩薩二軀，／此功德普及法界／衆生，但登佛果□。

□□四年正月／□□□日，佛弟／子李去泰敬造／阿彌陀像
一、救／苦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爲師／僧父母及法界衆
／蒼生見存眷屬，／早登正覺。

彬縣大佛寺石窟 1 條：

（前略）比丘神智上爲／聖神皇帝，下及師僧父母，一切父母，
一切善神，法界有情，／咸沐此恩，俱升佛果。／大周長壽二
年，歲在癸／巳，七月十五日神智記。

另外，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有一《大方廣十輪經》卷 3 寫本殘片，該卷
寫於文明元年（684），其題記中亦有「同登正覺」的祈願：

文明元年五月，清信佛弟子索世通，奉爲／亡考妣敬寫《十輪
經》一部。願亡者神生淨／土，法界衆生，同登正覺。¹⁰⁷

3. 其他表述方式，共 4 條，均在彬縣大佛寺石窟：

（前略）司馬李承基，誠／心法印，願庇慈雲，是用抽捨淨／
財，敬造出家菩薩。雕形作像，／感德巍巍，畫綵端容，莊嚴
□□。伏／願三明明具足，四果迴流，長依成／熟之緣，永證無
生之忍。／大周長壽三年，歲次甲午，四月／八日，中大夫行
幽州司馬弟子／李承基敬造。

¹⁰⁷ 〔日〕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頁 234；附圖頁 71，圖 209。另，該
寫卷正文末尾的文字爲：「守護共作伴黨，如是持戒比丘，便語國王及大臣，更至
他國。」通過比對，可以發現其正是《大方廣十輪經》卷 3 的末尾部分。

（前略）思叡敬造堊藏／菩薩一區，莊嚴已畢，庶超／三界，希遊四禪。（中略）大周證聖元年四月八／日，宣德郎行幽州司／戶參軍事元思叡造。

大周證聖元年四月八日，／朝議郎行幽州司戶參軍／事雲景嘉敬造堊藏菩薩，／……／……求方□之路□□含／……之□源……／□良。因飾靈跡於神龕，雕／□□於□□。□銘曰：／梵宇深沉，江流浩汗。庶歸／於福，果涉津梁。

大周聖曆元年四月八日，給事／郎行幽州新平縣丞高叔夏於／應福寺造堊藏菩薩兩軀。夫蠢／爾迷俗，小哉群品，皆桎梏於聲／利，共樊籠於貪欲焉。知苦海無／涯，重昏不曉。叔夏薄遊幽土，懷／□自安。歎泡沫之須臾，嗟蜉蝣／之倏忽，而淨信迴向，歸依勝果／。（後略）

這 4 條由當地官員所撰的造像記無論在文學修養上還是在佛學修養上都比一般造像記高得多，撰造者們顯然對《十輪經》所倡導的三乘皆修，由小乘而入大乘的思想有著相當深入的理解，證無生忍、超三界、涉津梁、依勝果等表達的都是證道成佛之意。

成佛是佛教信徒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 6 世紀初至 70 年代北方民衆的造像活動中，它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祈願內容。¹⁰⁸ 由隋入唐，在 8 世紀初之前的觀音、彌勒、彌陀等傳統題材的佛教造像中，對成佛的追求仍然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作為一種新的造像題材，地藏造像中出現這一祈願內容，既是信仰終極目的的體現，又表現了傳統強大的影響力。

其次，與證道成佛相關聯，一些造像記祈望衆生能出家修道。這樣的例子有 3 個，都在龍門石窟：

¹⁰⁸ 相關情況請參看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衆佛教信仰》，頁 204-211。

總章二年八月八日，□業、／法藏尚等造地藏菩薩一／軀。上
為皇帝及師僧父／母、法界衆生，□願出家。

處貞奉為陳七妹及十方／施主敬造地藏菩薩二區，／□萬劫千
生，不捨道心，常／逢善知識，出家修道。／大唐永隆元年十
二月卅日成。

大唐永隆二年二月□／日，處貞敬造地藏菩薩／二區，願法界
四生，從今／生盡未來際，不失正法，逢善知識，出家修道。

出家修道的目的是什麼呢？龍門石窟另外一條無紀年的造像記給出了答案：

深解為四／恩三有，法界／衆生，俱得／出家，成無／上道，
敬造／地藏菩薩／一軀供養。

也就是說，出家修道的最終目的乃是證道成佛，可見出家修道其實是證道成佛的一種途徑。這一途徑，與此前及當時其他題材的造像是不相同的。侯旭東先生討論北方第 5、6 世紀的造像記，不見論及「出家修道」，莊明興君發現，在龍門石窟，除以上造像記外，僅處貞所造五百區彌勒像的造像記中有「出家修道」的內容，¹⁰⁹ 而我在考察 8 世紀初以前隋唐的造像記時，同樣未發現其他題材的造像記還有相同內容。因此，我比較同意莊明興對這一現象的判斷，即，「地藏造像中出現這樣的題記，應能代表其特有的信仰特質之一」。至於為什麼代表了地藏信仰的特質，莊明興作了一些論述，¹¹⁰ 我在此再作申論。

其一，《十輪經》主張聲聞、獨覺、大乘三乘皆修，反對不學小乘唯學大

¹⁰⁹ 見莊明興，《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頁 100。該造像記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59，第 109 號。

¹¹⁰ 見莊明興，《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頁 100。

乘，而且在修學秩序上，認為應當先學小乘，後學大乘。經中說：「有諸眾生於聲聞乘、獨覺乘法未作劬勞正勤修學，如是眾生根機未熟，根機下劣精進微少。若有為說微妙甚深大乘法，說聽二人俱獲大罪，亦為違逆一切諸佛。」¹¹¹ 經中並要求眾生「成就十種有依行輪，於現身中速能殖聲聞乘種令不退失，或於現身成聲聞乘諸聖法器，非獨覺乘、大乘聖器。」¹¹² 其二，經中一方面反覆強調了出家者受到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慈悲護念，不允許王侯宰臣俗世人等的輕侮，另一方面又指出造五無間罪或根本大罪之人不合出家，也就是說不是人人都能出家修道的。因此，以上造像記祈願眾生不捨道心、不失正法，都能出家修道，從而成就無上道，應該正是來自於對《十輪經》內容的深入理解。

第三，為特定的亡者造像。在 40 條造像記中，有 8 條屬此類，其中龍門石窟有 6 條：

兗州都督府戶曹／路敬潛妻范陽盧／氏，奉為亡妣造地／藏菩薩一軀，願以／福因，上資冥（一作真）路。垂／拱三年三月五日造成記。

長壽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任智滿為／亡母敬造彌／陀像、地藏菩／薩、觀音菩／薩，願亡母往生西方。

……／……／造地藏菩薩一軀，／比丘尼恩恩為亡比忌日／……七月廿日成。／……造地藏菩薩一軀，／比丘尼恩恩為亡考忌日／……月七日造成。／敬造業道像七軀，比丘／尼恩恩為七世父母先亡……／神龍三年七月十四日造成。

清信女賈／為亡夫造／七佛，又造塋藏菩／薩一區。

¹¹¹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 6，《大正藏》冊 13，第 411 號，頁 754 上 29-中 4。

¹¹² 同前注，頁 753 中 25-28。

楊婆爲亡夫石／義，敬造聖藏菩／薩一軀……

王婆爲亡妹戒靜／造地藏菩薩一軀。

響堂山石窟有 1 條：

大周長安□□□□爲亡妻陳，敬造觀世音／菩薩、地藏□□存
□□□眷屬，一心供養佛。

造像碑 1 條：

永隆二年五月四日，雍州好時縣佛弟子張三娘爲亡夫及父、
婆、男女眷屬，敬造彌勒世尊、觀音、地藏二菩薩及鑄般若多
心經。息男張萬基。

中國人有很重的家庭觀念，這些造像記中的祈願對象，都是造像者的家庭成員。自 5 世紀以來，爲亡過的家庭成員造像，一直是佛教造像中的重要內容。這些造像，或祈願亡者離苦得樂，或祈願他們上昇天上、托生淨土，或祈願他們下生人間富貴之家、侯王之室。隋唐以來，隨著彌陀淨土信仰的興盛，願亡者托生西方淨土的祈願漸多，甚至不屬於淨土信仰的優填王造像中也有這樣的內容，¹¹³ 但是，在以上地藏造像中，我們僅見任智滿爲亡母所造彌陀、地藏、觀音的組合中有往生西方的祈願，4 條單獨的地藏造像記中，均無相關內容，這說明在當時一般民衆的心目中，地藏信仰與彌陀信仰之間似乎還是有一定界限的。另外，在 4 條單獨的地藏造像記中，有 3 條都沒有具體的祈願，路敬潛妻造像記中指出造像的目的是「願以／福因，上資冥（一作真）路」，

¹¹³ 例如：「顯慶四年七月四日，／李大娘爲亡夫斯法／才造優填王像一坩。／願託生西方，及法界／衆生，共同斯福。」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49，第 13 號。

也就是說為死者追福，其他幾條的作用應該也是一樣。

第四，為特定的動物造像，僅 1 例，在龍門石窟：

佛弟子普／光為驢阿／耆藏菩薩。

自 5 世紀以來，雖然眾多造像記中提到的「衆生」、「含識」、「有情」之類已將動物包括於其中，但單獨為特定的動物造像的還比較少見。《十輪經》中關於地藏於五趣或六道中的救濟功能或許是該造像記的理論根據。

第五，為來生祈福，有兩條，均在彬縣大佛寺：

（前略）朝散郎行豳／州司法參軍元海、通／直郎行豳州參軍事
／元會等，因生此州，□／於此寺敬造耆藏菩／薩像各一龕。

（中略）營此生□業□，當／來生之福田。

大周聖曆元年四月八日，給事／郎行豳州新平縣丞高叔夏於／
應福寺造耆藏菩薩兩軀。（中略）希樹福於禪門，庶傳銘於岩／
石。

《十輪經》中對營置福田相當重視，新譯本中還闡有〈福田相品〉，或許對以上造像記有一定影響。

第六，希望今世平安，病患早痊。在 40 條造像記中，僅兩例，在龍門石窟：

麟德元年五月六日，定／州安喜縣□丞張君實，為／法界衆
生、合家眷屬乞平安，口舌消除，敬造地藏／菩薩一軀，男
□□。

樹提伽願闔家平安／敬造耆藏菩薩□區。

但無年代線索的 14 條造像記中，還有 4 條有這樣的祈願內容，分別是裴羅漢願身平安造地藏與十一面觀音，景福寺比丘九娘為身患造觀音、地藏，趙行整為患腳得可造觀音、地藏，□／弘福妻□為身患願早差造地藏像。在中土的佛教造像活動中，對現世利益追求一直以來是非常重要的內容，而《十輪經》中亦反覆宣說稱念地藏菩薩名號、恭敬供養地藏菩薩能獲得種種現實利益，因此地藏造像記中出現這類祈願內容是自然而然的。倒是這幾條造像記中，有 3 條都是地藏、觀音一同出現，值得注意，這一現象或許反映了二者在救濟功能上的重合。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7 世紀中葉至 8 世紀初地藏造像記的祈願內容，深受傳統的影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自己的特質。這說明在經典的影響下，當時民衆對地藏信仰已有相當程度的理解。

附錄一：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表

時間	地點	造像	出處
唐貞觀末年或永徽年間 655 年以前	河南龍門賓陽南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1025 〈龍門〉 p. 28
唐龍朔年間 (661-663)	河北宣務山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宣務山〉 p. 56
唐麟德元年 (664)	河南龍門藥方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539 〈龍門〉 p. 27
唐乾封 2 年 (667)	河南龍門賓陽南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1016 〈龍門〉 p. 27
唐總章 2 年 (669)	河南龍門老龍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261 〈龍門〉 p. 27
唐咸亨元年 670 年 (按：此像有學者認為是後來補刻，我比較同意這一看法。目前暫將其列於此處。)	不詳	六道、左舒地藏菩薩坐像 1 軀 (沙門形)	《石佛》 p. 70
唐咸亨 4 年 (673)	河南龍門賓陽北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龍門〉 p. 28
唐上元元年 (674 或 760)	河北宣務山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支那美術史》
唐上元 2 年 (675)	河南龍門普泰洞外 1 龕	阿彌陀尊像、救苦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各 1 軀 (菩薩形)	〈龍門〉 p. 28

唐永隆元年 (680)	河南龍門萬佛洞 1 龕	地藏菩薩 2 軀 (菩薩形)	〈錄文〉 116 〈龍門〉 p. 28
唐永隆 2 年 (681)	河南龍門萬佛洞 1 龕	地藏菩薩 2 軀 (菩薩形)	〈錄文〉 120 〈龍門〉 p. 28
唐永隆 2 年 (681)	陝西乾州(今乾 縣)阡道鎮中巨寺	彌勒、觀音、地藏 及鑄般若多心經	《續編》 p. 3107
約唐高宗時 (650-683)	河南龍門雙窯 1 龕	彌陀、觀音、地藏 各 1 軀(菩薩形)	〈錄文〉 187 〈龍門〉 p. 28 〈雙窯〉 p. 125-127
約唐高宗時	河南龍門賓陽南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1025 〈龍門〉 p. 28 《八補》 p. 206
約唐高宗時	河南龍門敬善寺區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56 〈龍門〉 p. 28 《八補》 p. 220
約唐高宗時	河南龍門王元軌洞 兩側	兩尊左舒地藏菩薩 坐像(沙門形)	〈龍門〉 p. 30
約唐高宗時	四川通江千佛崖 第 29 窟右壁下方	左舒坐地藏菩薩 1 軀(按：該地藏身 體兩側各化出 1 道 祥雲，雲端各坐 5 像，有學者認為其 表現的是地藏十 王，非是。)	〈川北〉 p. 44
約唐高宗至武后時 (650-704)	河南龍門賓陽北洞 上方	五道地藏菩薩立像 (沙門形)	〈龍門〉 p. 30
約唐高宗至武后時	河南龍門八作司洞 下方	左舒地藏菩薩坐像 (沙門形)	〈龍門〉 p. 31

武周垂拱 3 年 (687)	河南龍門袁弘勳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22 〈龍門〉 p. 28
武周長壽 2 年 (693)	河南龍門蓮花洞 1 龕	阿彌陀佛、地藏菩薩、 觀音菩薩各 1 軀 (菩薩形)	〈錄文〉 380 〈龍門〉 p. 28
武周長壽 2 年 (693)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東壁 Q123 號龕 (比丘神智)	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 (佛像裝)	《彬縣》 p. 150
武周長壽 3 年 (694)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東壁 Q123 號龕 (李承基)	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 (佛像裝或為沙 門形)	《彬縣》 p. 150
武后證聖元年 (695)	河北邯鄲南響堂 3-39	地藏菩薩 1 軀 (沙門形)	〈南響〉 p. 11
武后證聖元年 (695)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東壁 Q32 號龕 (元思叡)	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 (佛像裝)	《彬縣》 p. 111, p. 119
武后證聖元年 (695)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東壁 Q32 號龕 (雲景嘉)	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 (佛像裝)	《彬縣》 p. 111, p. 119
武后證聖元年至 萬歲通天二年間 (695-697)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東壁 Q32 號龕 (元海、元會 等人)	舒相坐地藏菩薩 4 軀 (佛像裝。按： 此龕共有地藏像 6 尊，均兩兩相對， 元海等人各造 1 軀，估計他們共造 4 軀。)	《彬縣》 p. 111, p. 119

武周聖曆元年 (698)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西壁 Q19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2 軀 (佛像裝)	《彬縣》 p. 107-108
武周聖曆 2 年 (699)	河北邯鄲南響堂 第 6 洞	彌勒、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各 1 軀 (菩薩形立像)	《響堂》 52, p. 37
唐長安年間 (701-704)	河北邯鄲南響堂 第 1 洞	觀世音菩薩、地藏 菩薩各 1 軀 (左舒沙門形)	《響堂》 9, p. 17
唐長安 4 年 (704)	河南龍門雙洞	阿彌陀佛、地藏菩 薩各 1 軀 (菩薩形)	《八補》 p. 212 中 〈目錄〉 2350
約武周時期 (690-704)	河南龍門惠簡洞 1 龕	七佛、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55 〈龍門〉 p. 29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袁弘勳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錄文〉 57 〈龍門〉 p. 28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清明寺洞 1 龕	觀世音菩薩、地藏 菩薩各 1 軀 (菩薩形)	〈錄文〉 199 〈龍門〉 p. 29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清明寺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207 〈龍門〉 p. 29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清明寺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208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清明寺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龍門〉 p. 29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老龍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菩薩形)	〈錄文〉 276 〈龍門〉 p. 29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萬佛洞 1 龕	地藏菩薩 1 軀	北圖拓片 繆專 2634-364
約武周時期	河南龍門惠簡洞	地藏菩薩 1 軀	北圖拓片 造像 5811 〈惠簡〉 p. 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西壁 Q14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 p. 10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西壁 Q23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 p. 111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西壁 Q24 號龕	左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 p. 111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西壁 Q25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 p. 111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中心柱東壁 Q35 號龕	左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 p. 119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西壁 Q59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 p. 123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西壁 Q65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2 軀（佛像裝）	《彬縣》 p. 12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東壁 Q113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 p. 14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東壁 Q114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4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東壁 Q115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2 軀（佛像裝）	《彬縣》p. 14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東壁 Q116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4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東壁 Q118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2 軀（佛像裝）	《彬縣》p. 14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東壁 Q119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2 軀（佛像裝）	《彬縣》p. 14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東壁 Q127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51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南壁 Q129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54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南壁 Q130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石 雕）	《彬縣》p. 154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南壁 Q131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54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南壁 Q133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54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東門柱南壁 Q135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54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西門柱南壁 Q155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62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西門柱南壁 Q162 號龕	左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6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西門柱南壁 Q163 號龕	左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67
約武周時期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西門柱西壁 Q165 號龕	左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佛像裝）	《彬縣》p. 167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268 號龕	舒相坐地藏菩薩 2 軀（沙門形）	《廣元》p. 125, p. 132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256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沙門形）	《廣元》p. 132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726 附 58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沙門形）	《廣元》p. 132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535 附 2 號龕	左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沙門形）	《廣元》p. 132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535 附 3 號龕	左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沙門形）	《廣元》p. 132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535 附 42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沙門形）	《廣元》p. 127, p. 132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535 附 48 號龕	右舒相坐地藏菩薩 1 軀（沙門形）	《廣元》p. 132
約武周時期	四川廣元千佛崖 576 號龕	觀音、地藏各 1 軀 （沙門形立像）	《廣元》p. 129, p. 134

初唐時期	敦煌莫高窟 333 窟 東壁門南	地藏菩薩壁畫 1 鋪 (沙門形立像)	〈唐前期敦煌〉 p. 22
初唐時期	敦煌莫高窟 333 窟 東壁門北	地藏菩薩壁畫 1 鋪 (沙門形立像)	〈唐前期敦煌〉 p. 22
初唐時期	敦煌莫高窟 372 窟 東壁門南	地藏與十佛壁畫 1 鋪 (沙門形立像)	〈初探〉 pp. 23-24 〈唐前期敦煌〉 p. 22
唐神龍元年 (705)	河北邯鄲南響堂 第 4 洞入口門右側	地藏菩薩、觀世音 菩薩各 1 軀 (沙門形舒相坐)	《響堂》 42, p. 29
唐神龍 3 年 (707)	河南龍門龍華寺外 1 龕	地藏菩薩 2 軀、業 道像 7 軀	〈錄文〉 707 〈龍門〉 p. 28
唐景龍 2 年 (708)	不詳	地藏菩薩、觀世音 菩薩各 1 軀	傳拓 T675.2.4462
唐景龍 2 年 (708)	彬縣大佛寺千佛洞 窟室西壁 Q69 號龕	藥師佛、觀音、地 藏各 1 軀	《彬縣》 p. 127
唐景龍 2 年 (708)	河北邯鄲南響堂 第 2 洞	地藏菩薩、觀世音 菩薩各 1 軀 (左舒 沙門形)	《響堂》 29, p. 23
唐景龍 4 年 (710)	河北邯鄲南響堂 第 2 洞	地藏菩薩、觀世音 菩薩、大勢至菩薩 各 1 軀 (半跏趺 坐)	《響堂》 30, p. 23
唐景雲元年 (710)	河南龍門淨土堂 1 龕	觀世音菩薩、地藏 菩薩各 1 軀 (菩薩 形)	〈龍門〉 p. 28
唐景雲 2 年 (711)	河南龍門老龍洞 1 龕	阿彌陀佛、地藏、 觀音菩薩各 1 軀 (菩薩形)	〈龍門〉 p. 28

唐先天元年 (712)	河北邯鄲南響堂 第2洞	地藏菩薩、觀世音 菩薩各1軀（沙 門形半跏趺坐）	《響堂》31, p. 23
----------------	----------------	--------------------------------	---------------

附錄一書目略語：

- 〈川北〉：丁明夷，〈川北石窟雜記——從廣元到巴中〉。
- 〈目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目錄〉。（其後數字為該造像記之目錄編號）
- 〈初探〉：潘亮文，〈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
- 〈南響〉：邯鄲市峰峰礦區文管所、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南響堂石窟新發現窟簷遺跡及龕像〉。
- 〈宣務山〉：張稼農，〈隆堯縣宣務山文物古跡介紹〉。
- 〈唐前期敦煌〉：王惠民，〈唐前期敦煌地藏圖像考察〉。
- 〈惠簡〉：龍門石窟研究所〈龍門565號窟（惠簡洞）調查簡報〉。
- 〈稿本〉：〔清〕陸蔚庭，〈龍門造像目錄〉稿本。
- 〈錄文〉：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錄文〉。（其後數字為該造像記之錄文編號）
- 〈龍門〉：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
- 〈雙窯〉：龍門文物保管所（溫玉成執筆），〈洛陽龍門雙窯〉。
- 《八補》：〔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
- 《支那美術史》：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
- 《石佛》：李靜傑編，〈石佛選粹〉。
- 《彬縣》：常青編，〈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
- 《廣元》：雷玉華、王劍平編著，〈廣元石窟〉。
- 《續編》：〔清〕陸耀燾撰，陸增祥校訂，〈金石續編〉。
- 《響堂》：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響堂山石窟〉。（前一數字為錄文編號，後一數字為書中介紹該造像的頁碼）

附錄二：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初地藏造像記

(一) 河北宣務山

1. 〔唐〕比丘尼真□造地藏像記（661-663 年）

龍朔□年□月十五日，比丘尼真□□□地藏菩薩。

見張稼農〈隆堯縣宣務山文物古跡介紹〉，頁 56。此條造像記被與開元廿□年的造像記合錄在一起，但顯然是兩條造像記。地藏前兩闕字可能是「敬造」。

2. 〔唐〕齊大雅等造地藏像記（674 或 760 年）

齊大雅尚善會李名高造地藏像。上元元年二月十日。

見〔日〕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轉錄自潘亮文《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頁 39。

(二) 河南龍門石窟

1. 〔唐〕定州安喜縣□丞張君實造地藏菩薩記（664 年）

麟德元年五月六日，定／州安喜縣□丞張君實，爲／法界衆生、合家眷屬乞平安，口舌消除，敬造地藏／菩薩一軀，男□□。

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錄第二〈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92 上，第 539 號。「軀」前「一」字據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補，頁 27。

2. 〔唐〕□德子造地藏菩薩記（667 年）

乾封二年四月八日，弟子□德子敬造地藏□□。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360 下，第 1016 號。

3. 〔唐〕□業、法藏尚等造地藏菩薩記（669 年）

總章二年八月八日，□業、／法藏尚等造地藏菩薩一／軀。上爲皇帝及師僧父／母、法界衆生，□願出家。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9 下，第 261 號。「月」前「八」字據〔清〕

陸蔚庭稿本〈龍門造像目錄〉補，頁 95。¹¹⁴

4. 〔唐〕將作監丞牛懿德造地藏菩薩記（673 年）

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將作監丞牛／懿德造地藏菩薩一軀。

見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7。〈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5. 〔唐〕造彌陀觀音地藏像記（675 年）

上元二年二／月六日，弟子／□□□母喬□□在下婦／□□藏等，今／□□造阿彌／陀尊像一區／□救苦觀世／音菩薩一區／□地藏菩薩／一區，今並成／就，以此福□，／普遍一切蒼／生，同斯福果。

〈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6. 〔唐〕處貞爲陳七妹等造地藏菩薩記（680 年）

處貞奉爲陳七妹及十方／施主敬造地藏菩薩二區，／□萬劫千生，不舍道心，常／逢善知識，出家修道。／大唐永隆元年十二月卅日成。

〈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亦收入此造像記，題作「唐施主造地藏記」，「施主」前 10 字脫漏，「二區」兩字亦未錄出，見頁 260 上，第 116 號。此處處貞與下條之處貞是同一個人。

7. 〔唐〕處貞造地藏菩薩記（681 年）

大唐永隆二年二月□／日，處貞敬造地藏菩薩／二區，願法界四生，從今／生盡未來際，不失正法，逢善知識，出家修道。

〈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0 下亦收入此造像記（第 120 號），但「知」、「出」二字未錄出。

8. 〔唐〕路敬潛妻盧氏造地藏菩薩記（687 年）

¹¹⁴ 〔清〕陸蔚庭，〈龍門造像目錄〉，頁 95。

兗州都督府戶曹／路敬潛妻范陽盧／氏，奉爲亡妣造地／藏菩薩一軀，願以／福因，上資冥路。垂／拱三年三月五日造成記。

〈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50 上亦有錄文（第 22 號），但「兗州都督府戶曹」7 字脫漏，「冥」作「真」；「年」作「歲」。另，陸蔚庭稿本中，「潛」字錄作「替」字，頁 97。

9. 〔唐〕任智滿造阿彌陀地藏觀音像記（693 年）

長壽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任智滿爲／亡母敬造彌／陀像、地藏菩／薩、觀音菩／薩，願亡母往生西方。

見〈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79 上，第 380 號。陸蔚庭稿本中，「任」字作「杜」字，並注云：「杜一釋任」，頁 97。

10. 〔唐〕造彌陀地藏像殘刻（704 年）

□下……／見存……／彌陀……／壘藏……／伏願……／心供……／□……／長安四／年□月□／□成。

此條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32，頁 212 中。〈龍門石刻錄·錄文〉及常青文章失收。據陸氏云，此殘刻「高下不齊，廣約九寸，存十行，行字不一」，暫逐錄如上。

11. 〔唐〕比丘尼恩恩造地藏業道像記（707 年）

……／……／造地藏菩薩一軀，／比丘尼恩恩爲亡比忌日／……七月廿日成。／……造地藏菩薩一軀，／女比丘尼恩恩爲亡考忌日／……月七日造成。／敬造業道像七軀，比丘／尼恩恩爲七世父母先亡……／神龍三年七月十四日造成。

見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71 上亦有錄文（第 278 號），但脫漏較多，「女」字據補。此造像記其實包含 3 個造像記，前兩個造像的時間很可能也在神龍三年左右。以往錄文均將其錄合在一起，此處亦遵從之。

12. 〔唐〕造觀音地藏像記（710 年）

……觀／世音菩薩一／區、地藏菩薩一區，□□／成就。景雲元年□□／十二日。

〈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13. 〔唐〕造彌陀地藏觀音像記（711 年）

……／……／娘……／……／……／……彌陀佛……／……地藏／……軀觀／音菩薩一區。普為師僧父／母及一切衆生，／常得安樂，元諸／永離苦，願俱登／正果。景雲二年八月八日／造成。

〈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元諸／永離苦」疑有誤。

14. 〔唐〕甘大娘造觀世音地藏菩薩記

弟子甘大娘奉／為二親及以自身，／敬造觀世音菩／薩、峯藏菩薩二軀，／此功德普及法界／衆生，但登佛果□。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5 下，第 199 號。「峯」字據陸蔚庭稿本改回原樣，頁 105。

15. 〔唐〕普光師造地藏菩薩記

普光師敬造／峯藏菩薩一區。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6 上，第 207 號。「峯」字據常青文改回原樣，頁 29。

16. 〔唐〕普光造地藏菩薩記

佛弟子普／光為驢阿／峯藏菩薩。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6 上，第 208 號。「峯」字據陸蔚庭稿本改回原樣，頁 98。

17. 〔唐〕清信女賈造像記

清信女賈／為亡夫造／七佛，又造峯藏菩／薩一區。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52 下，第 55 號。「峯」字據陸蔚庭稿本改回原樣，頁 98。

18. 〔唐〕溫玉造地藏菩薩記

太子文學 \square 事……男／溫玉造坭藏菩薩一軀。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52 下，第 57 號。「男」字據常青錄文補。「學 \square 事」二字據北圖拓片「造像 6028」號補。

19. 〔唐〕楊婆造地藏菩薩記

楊婆爲亡夫石／義，敬造坭藏菩／薩一軀……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71 上，第 276 號，「軀」字據常青錄文補。「坭」字據陸蔚庭稿本改回原樣，頁 106。

20. 〔唐〕造地藏像記

佛弟子 $\square\square$ ／光子 $\square\square$ 造／坭藏像一龕 $\square\square$ 。

見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9。〈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21. 〔唐〕造地藏菩薩像記

……／身……／坭藏菩／薩 \square 區。

據北圖拓片「繆專 2634-364」號錄文。

22. 〔唐〕樹提伽造地藏菩薩像記

樹提伽願闔家平安，／敬造坭藏菩薩 \square 區。

據北圖拓片「造像 5811」號錄文。

23. 〔唐〕李 \square 靜造地藏菩薩記

李 \square 靜／造地藏菩薩一軀。

見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8。〈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24. 〔唐〕李去泰造阿彌陀救苦觀世音地藏菩薩記

$\square\square$ 四年正月／ $\square\square\square$ 日，佛弟／子李去泰敬造／阿彌陀像
一、救／苦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爲師／僧父母及法界衆
／蒼生見存眷屬，／早登正覺。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4 下，第 187 號，「衆」字據常青錄文補，

「早」字原作「俱」字，據常青錄文改。

25.〔唐〕王婆造地藏菩薩記

王婆爲亡妹戒靜／造地藏菩薩一軀。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361 下，第 1025 號。另，北圖「繆專 2634-622」號拓片可識讀如下：「王婆……／地藏菩薩……」很可能與本造像記同爲一條，附錄於此，不單列。

26.〔唐〕僧知道造地藏菩薩記

僧知道爲入遼／兄造地藏菩薩。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52 下，第 56 號。

27.〔唐〕弁空造地藏菩薩記

弁空普爲／四生俱得／解脫，敬造／地藏供養。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2 上，第 147 號。

28.〔唐〕深解造地藏菩薩記

深解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俱得／出家，成無／上道，

敬造／地藏菩薩／一軀供養。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2 上，第 149 號。

29.〔唐〕景福寺比丘尼九娘造阿彌陀觀音地藏記

景福寺比丘尼九娘，爲亡母郭／敬造彌陀像一鋪供養。又爲／

身患，敬造觀音、地藏各／一軀供養。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65 上，第 196 號。

30.〔唐〕李慶造地藏菩薩記

李慶／造地藏／菩薩。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51 下，第 44 號（B）。

31.〔唐〕趙行整造救苦觀世音地藏菩薩記

佛弟子趙行／整，比爲患腳得可，敬／造救苦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一區，／爲七世父母／妹一心供養。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72 下，第 301 號。

32. 〔唐〕裴羅漢造地藏觀音十一面菩薩記

清信佛弟子／裴羅漢，爲七世父母願身平／安，敬造地藏、／
觀音十一面菩／薩各一軀。以斯／功德散沾法／界衆生，咸同
／此福。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80 下，第 402 號。陸蔚庭稿本「裴」字作
「張」字。

33. 〔唐〕張慶宗造地藏菩薩記

弟子張慶宗，／爲所生父母造／地藏菩薩一／區，闔家供養。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288 下，第 486 號。

34. 〔唐〕汾州介休縣□弘福妻□造地藏菩薩記

汾州介□休／縣弟□子□／弘福妻□，／爲身患願／早差，敬造／
地藏菩薩／一區，闔家／供養。

〈龍門石刻錄·錄文〉頁 319 上，第 782 號。北圖拓片「造像 5149」號
即此條造像記，惜漫漶嚴重。

35. 〔唐〕……□九師造地藏觀音像記

……□九師敬造地藏觀音各一區。

據北圖拓片「造像 5664」錄文，「九」或爲「旭」。

36. 〔唐〕造地藏像記

神？禮？造地藏供養。

見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9。〈龍門石刻錄·錄
文〉失收。

37. 〔唐〕仲山造地藏像記

仲山敬造地藏供養。

〈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9。〈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38. 〔唐〕焦大明造佛觀音地藏像記

此造像記爲焦大明造佛、觀音、地藏像各 1 軀。具體內容暫缺。見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頁 29。〈龍門石刻錄·錄文〉失收。

39. 〔唐〕比丘尼七誓造地藏菩薩像記

比丘尼七誓造地藏菩薩。

據北圖拓片「繆專 2634-971」號錄文。〈龍門石刻錄·目錄〉僅有題目，無內文，且「誓」字作「誓」字。頁 420，第 1311 號。

40. 〔唐〕爲母造地藏菩薩像記

……母……／地藏／菩薩一區。

據北圖拓片「繆專 2634-74」號錄文。〈龍門石刻錄·目錄〉僅有題目，無內文，且題作「□□□母造地藏菩薩像記」。頁 443，2207 號。

（三）陝西彬縣大佛寺

1. 〔唐〕比丘神智造像記（693 年）

祥夫安□三日，來下神／儀，道樹六年，尚隔靈軌。／是以三千剎土，百億大／王，各寫神容，僉慕聖跡。／是如來之相好，四八無／虧，工妙質於荆山，三千具足。神智私祈覺力，遂／感玉裕之日彩端嚴，日暉園□，夙願天成，□符／靈相。但一言感善，非海／壑所遷，六度居心，豈江／淮能亶？報同指掌，義無／差感。比丘神智上爲／聖神皇帝，下及師僧父母，一切父母，一切善神，法界有情，／咸沐此恩，俱升佛果。／大周長壽二年，歲在癸／巳，七月十五日神智記。

錄自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50。〔清〕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2 亦有錄文，頁 16947，但闕字稍多。「是如來之相好」中「是」字毛錄作「近」字；「虧」作「虧」，是；「遂／感玉裕之日彩端嚴」作「□感玉□□姿月彩□□」（綜合兩種錄文，則此句應作：「遂感玉裕之姿，月彩端嚴」）；「園」作「圓」；「夙願」作「風韻」，是；「一切父母」四字毛錄脫漏；「佛果」作「仙果」。

2. 〔唐〕李承基造像記（694 年）

夫以提耶妙說，法聲應而降魔；／如意寶□，神光觸而除惡。
由是／百千菩薩，俱乘□首之尊；八十／須婆，會集歸依之
□。故得而花／遍滿，天雨飛騰。淨有□其稱揚，／渴仰恭其
讚歎。司馬李承基，誠／心法印，願庇慈雲，是用抽捨淨／
財，敬造出家菩薩。雕形作像，／感德巍巍，畫綵端容，莊嚴
□□。伏／願三明具足，四果迴流，長依成／熟之緣，永謐無
生之恩。／大周長壽三年，歲次甲午，四月／八日，中大夫行
幽州司馬弟子／李承基敬造。

錄自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50-151。〔清〕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2 亦有錄文，頁 16947。兩種錄文雖多處不同，但可互補。「耶」毛錄作「邪」；「如意」作「知意」，誤；「寶」後的闕字作「珠」，是；「由」作「田」，誤；「首」前闕字作「稽」，是；「須」作「頰」，毛錄是；「歸依之」後的闕字作「聖」，恐是；「而花」作「天花」，是，武周新字中「天」與「而」形近；「天雨」作「大雨」，是；「淨有」後之闕字作「儼」；「雕形」作「雕琅」；「感」作「威」；「成熟」作「正□」；「謐」作「證」，是；「恩」作「忍」，是。

3. 〔唐〕元思叡造像記（695 年）

夫日容含睟，卅相之殊姿；／月面流光，八十種之奇狀／。故能獨高天上，稱妙覺而／為尊；孤標堊前，顯能仁以／居大。昭慧燈於冥隧，運慈／棧於迷津。思叡敬造堊藏／菩薩一區，莊嚴已畢，庶超／三界，希遊四禪。既登[巒]而／□[歎]，□[琰]而斯鑄銘曰／：□□□□，依依鷲峰。爰跡／石壁，[我]啓金容。岩傳清梵／，穀響疏鍾。爐煙霏栢，蓋影／□松。瞻顏如在，式展虔恭。／大周證聖元年四月八／日，宣德郎行幽州司／戶參軍事元思叡造。

此條逐錄自〔清〕葉昌熾《邠州石室錄》卷 1，頁 10944，「□琰而斯鑄銘曰」句，疑有脫漏。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19 亦有錄文。「睟」常錄作「眸」，誤；「卅」作「丹」，誤；「天」作「而」，誤；「孤

標」作「以櫟」，誤；「隧」作「遂」，誤；「跡」作「疏」，誤；「栢」作「柏」；「松」前闕字作「形」，或是。

另，〔清〕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2 亦有錄文，頁 16947-16948。「稱」毛錄作「利」，誤；「楫」作「楫」，誤；「跡」作「疏」，誤；「證聖」作「聖曆」，誤。

4. 〔唐〕雲景嘉造象記（695 年）

大周證聖元年四月八日，／朝議郎行幽州司戶參軍／事雲景嘉敬造塋藏菩薩，／……／……求方□之路□□含／……之□源……／□良。因飾靈跡於神龕，雕／□□於□□。□銘曰：／梵宇深沉，江流浩汗。庶歸／於福，果涉津梁。

此條錄自〔清〕葉昌熾《邠州石室錄》卷 1，漫漶之處較多，頁 10946。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19 亦有錄文，基本相同。

5. 〔唐〕元海元會等造像記（695 年前後）

竊以妙覺慈啓因緣／之靈跡，大雄闡聖明／六□之芳類。故能非／身現身，總群生於壽／域；無相示相，引庶品／於良源。朝散郎行幽／州司法參軍元海、通／直郎行幽州參軍事／元會等，因生此州，□／於此寺敬造塋藏菩／薩像各一龕。雕鏤始／就，□素□□。□琅壁／以端容，指玉豪而□／象。□□翰墨以勒銘／：□□□□□□千／大千。宏敷妙跡，廣開／良緣。金容炫彩，紺□／□□。營此生□業□，當／來生之福田。

此造像記逐錄自〔清〕葉昌熾《邠州石室錄》卷 1，頁 10945。葉氏云：「此刻鋒穎磨損，兩元字下僅存殘筆，上一字似『海』，下一字似『會』」。並云：「元魏自孝文徙都中夏，其後散居京邑。《隋書》諸元皆洛陽人，今云因生此州，或是父母宦游邠土，生長於斯，非必土著也。」

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19 亦有錄文。「因」常錄作「四」，誤；「闡」作「間」；「總」作「納」；「龕」作「區」；「琅」前闕字作「間」；「象」前無闕字，「象」後第一個闕字作「父」，恐誤；「敷」作「敦」。

另，此造像記無時間記載，但與它同龕（千佛洞中心柱東壁 Q32 號龕）的元思叡、雲景嘉造像時間均為武周證聖元年（695），而且，該龕左側還有一則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元岩所寫題記：「元岩萬歲通天二年七月廿七日拜辭」，則元岩很可能為元海元會等造像者中一人，造像的時間當在萬歲通天二年之前，極可能也是證聖元年。

6. 〔唐〕高叔夏造像記（698年）

大周聖曆元年四月八日，給事／郎行幽州新平縣丞高叔夏於／應福寺造坐藏菩薩兩軀。夫蠢／爾迷俗，小哉群品，皆桎梏於聲／利，共樊籠於貪欲焉。知苦海無／涯，重昏不曉。叔夏薄遊幽土，懷／□自安。歎泡沫之須臾，嗟蜉蝣／之倏忽，而淨信迴向，歸依勝果／。□跡崖鑿石，啓經行之坐，面林／□葩，對禪誦之堂。然而圖滿月□／□容，開天日之靈相。憑茲八／□，泛寶船而救沉溺；託彼雙林／，□惠陰而庇交□。嗚呼！光陰驟／□，□代不留，雖復釋梵貽教，歷／□劫而逾闢；將恐丹青遺像，經／歲年而堙滅。所以刻石甄形，期／於永固，鑲金爲字，庶之無窮。乃／爲銘曰：重昏窅窅，彼岸悠悠。開耀資其惠日，利涉憑其寶舟。歎浮生之倏瞬，悲人代之流易。希樹福於禪門，庶傳銘於岩／石。

此造像記逐錄自〔清〕葉昌熾《邠州石室錄》卷 1，頁 10948。〔清〕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2 有錄文，頁 16947-16948。「跡」字毛誤錄作「疏」字；「滿月□／□容」中間所缺兩字毛錄作「之晬」，或有所據。另，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07-108 亦有錄文。

（四）河北響堂山石窟

1. 〔唐〕□娘、男元琰造地藏菩薩像記（695年）

大周證聖元年，歲次乙未，十月乙亥朔廿二日景申，佛弟子／□娘、男元琰謂亡夫高禮澄敬造沙門地藏菩／薩□鋪。上爲聖母皇帝，下爲七代亡過父母，見存／□府福貴（？）莊嚴法界蒼生，俱登正覺。

此造像記見邯鄲市峰峰礦區文管所、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南響堂石窟新發現窟簷遺跡及龕像〉，頁 12。「周」、「薩」二字係筆者所補。

2. 〔唐〕王大貞等造彌勒觀音地藏菩薩記（699 年）

大周聖曆二年九月廿日，滏陽縣飮山鄉人王大貞及妻高，上爲神皇師僧，／下見存父母，闔家無災難，／七代先亡，群生淨土，敬造／彌勒像、觀音菩薩、坵藏菩薩供養。普共一切含生，俱發無上道心，摠□□覺。

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響堂山石窟》附錄三〈響堂山石刻錄·錄文〉，頁 132。

3. 〔唐〕爲亡妻陳造觀音地藏菩薩像記（701-704 年）

大周長安□□□□爲亡妻陳，敬造觀世音／菩薩地藏□□存□□□眷屬，一心供養佛。

《響堂山石窟》附錄三〈響堂山石刻錄·錄文〉，頁 123。

4. 〔唐〕荊義振造地藏觀音像記（705 年）

神龍元年四一月□，荊義振爲……敬／造地藏菩薩，女大娘敬造觀世音／菩薩，上爲則天□□／……／……下及／師僧父母、七世先亡、見眷／屬，同時成佛。

《響堂山石窟》附錄三〈響堂山石刻錄·錄文〉，頁 130。「四一月□」疑有誤。

5. 〔唐〕吳四娘造地藏觀音勢至像記（710 年）

景龍四年二月十日，弟子／吳四娘爲父母敬造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大世主菩薩，上爲天皇天后，自爲／□□□，闔家大小，俱登正／覺。

《響堂山石窟》附錄三〈響堂山石刻錄·錄文〉，127 頁。據《響堂山石窟》，頁 23 的介紹，這裏的「大世主菩薩」即大勢至。

6. 〔唐〕荊□□等造地藏觀音像記（712 年）

先天元[]年四月四日，佛弟／子荊[][]二女郭件／娘，敬造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二軀，上爲聖神皇帝、七世先亡、師僧父母，／俱越[][]，[]登覺道。

《響堂山石窟》附錄三〈響堂山石刻錄·錄文〉，頁 127。據《舊唐書·睿宗紀》，景雲三年（712）正月改元爲太極，四月又改元爲延和，八月傳位玄宗，改元爲先天。故這條題記很可能是改元先天之後補刻的。

（五）造像碑

1. 〔唐〕張三娘造像並鑄《心經》題記（681 年）

永隆二年五月四日，雍州好畤縣佛弟子張三娘爲亡夫及父、婆、男女眷屬，敬造彌勒世尊、觀音、地藏二菩薩及鑄《般若多心經》。息男張萬基。

見〔清〕陸燿燾撰，陸增祥校訂《金石續編》卷 5，頁 3107。據介紹，該碑「石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二寸。正面造像，碑陰刻《多心經》並記，十七行，行二十字，正書。在陝西乾州阡道鎮中巨寺。」

引用文獻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大正藏》冊 10，第 300 號。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94 年 1 版 3 刷。
-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大正藏》冊 10，第 301 號。
- 《大方廣十輪經》。《大正藏》冊 13，第 410 號。
-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大正藏》冊 13，第 411 號。
-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大正藏》冊 20，第 1092 號。
- 《佛說地藏菩薩陀羅尼經》。《大正藏》冊 20，第 1159B 號。
-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大正藏》冊 21，第 1320 號。
- 《念佛鏡》。《大正藏》冊 47，第 1966 號。
- 《歷代三寶記》。《大正藏》冊 49，第 2034 號。
-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冊 50，第 2054 號。
- 《續高僧傳》。《大正藏》冊 50，第 2060 號。
- 《辯正論》。《大正藏》冊 52，第 2110 號。
- 《衆經目錄》。《大正藏》冊 55，第 2146 號。
- 《衆經目錄》。《大正藏》冊 55，第 2147 號。
- 《大週刊定衆經目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3 號。
- 《開元釋教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4 號。
- 《像法決疑經》。《大正藏》冊 85，第 2870 號。
- 《地藏菩薩像靈驗記》。《續藏經》冊 14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94 年 1 版 3 刷。

古籍

- 《八瓊室金石補正》。〔清〕陸增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 《石門文字禪》。〔宋〕惠洪。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 《邠州石室錄》。〔清〕葉昌熾。《石刻史料新編》第 2 輯，冊 1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
- 《金石萃編》。〔清〕王昶。《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冊 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 版，1982 年。
- 《金石續編》。〔清〕陸燿燾撰，陸增祥校訂。《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冊 4。

-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版，1982年。
- 敦煌寫本北 8422（重 22）號。《敦煌寶藏》冊 110。黃永武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
-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
- 〈龍門造像目錄〉。〔清〕陸蔚庭。稿本。《文物》4-5。頁 89-106。1961年。
-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
-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清〕毛鳳枝。《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冊 2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版，1982年。

中日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丁明夷（1979）。〈龍門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與類型〉。《考古學報》4。頁 519-545。
- 丁明夷（1990）。〈川北石窟筭記——從廣元到巴中〉。《文物》6。頁 41-53。
- 大村西崖（1915）。《支那美術史雕塑篇》。東京：佛書刊行會圖像部。（此書目見附錄一）
- 尹富（2006a）。〈《十輪經》中土傳播研究〉。《社會科學戰線》5。頁 148-152。
- 尹富（2006b）。〈地藏菩薩及其信仰傳入中國時代考〉。《四川大學學報》2。頁 63-70。
- 尹富（2007a）。〈《地藏菩薩本願經》綜考〉。《四川大學學報》6。頁 48-56。
- 尹富（2007b）。〈中國早期地藏信仰狀況論考〉。《文史哲》4。頁 35-41。
- 尹富（2008）。〈論三階教與地藏信仰——兼論淨土教對地藏信仰的吸收與排斥〉。《國學研究》21。頁 127-156。
-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1937）。《響堂山石窟》。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此書目見附錄一）
-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1980）。《龍門石窟の研究》。京都：同朋舍。覆刻本。
- 王惠民（2005）。〈唐前期敦煌地藏圖像考察〉。《敦煌研究》3。頁 18-25。
- 王景荃（2000）。〈試論北朝佛教造像碑〉。《中原文物》6。頁 36-45。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1989）。《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冊 36。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矢吹慶輝（1927）。《三階教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西本照真（1998）。《三階教之研究》。東京：春秋社。
- 李淞（2002）。《長安藝術與宗教文明》。北京：中華書局。

- 李靜傑（1995）。《石佛選粹》。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 汪娟（1998）。《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
- 周叔迦、蘇晉仁（2003）。《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 邯鄲市峰峰礦區文管所、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1992）。〈南響堂石窟新發現窟簷遺跡及龕像〉。《文物》5。頁 1-15。（此書目見附錄一）
- 侯旭東（1998）。《五、六世紀北方民衆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胡良學、蔣德才（1997）。〈大足石刻地藏造像初識〉。《四川文物》2。頁 39-43。
- 袁虹（1995）。〈南響堂山石窟唐代小龕初探〉。《華夏考古》1。頁 91-100。
- 常青（1991）。〈龍門石窟「北市彩帛行淨土堂」〉。《文物》8。頁 66-73。
- 常青（1993）。〈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中原文物》4。頁 27-34。
- 常青（1998）。《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北京：現代出版社。
- 張維（1982）。《隴右金石錄》。《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冊 2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 版。
- 張稼農（1957）。〈隆堯縣宣務山文物古跡介紹〉。《文物參考資料》12。頁 56-58。
- 張總（2003）。《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莊明興（1999）。《中國中古的地藏信仰》。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1982）。《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
- 湯用彤（1982）。《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湯用彤（1997）。《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溫玉成（1988）。〈洛陽龍門雙窯〉。《考古學報》1。頁 101-131。
- 雷玉華、王劍平（2002）。《廣元石窟》。成都：巴蜀書社。
- 潘亮文（1999）。《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學院發行。
- 範祥雍（2000）。《釋迦方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
- 閻文儒（1987）。《中國石窟藝術總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龍門石窟研究所（1995）。《龍門石窟雕刻萃編——佛》。北京：文物出版社。
- 龍門石窟研究所（2001）。〈龍門 565 號窟（惠簡洞）調查簡報〉。《中原文物》5。頁 4-14。（此書目見附錄一）
- 聶士全（1996）。〈地藏信仰與金地藏研究述評〉。《法音》7。頁 21-28。
- 羅世平（1998）。〈地藏十王圖像的遺存及其信仰〉。《唐研究》4。頁 373-414。
- 羅華慶（1993）。〈敦煌地藏圖像和「地藏十王廳」研究〉。《敦煌研究》2。頁 5-14。
- 〈隆堯縣文物古跡——宣務山石窟〉。2006.08.11，
http://www.he.xinhuanet.com/zfwq/2006-08/11/content_7755325_4.htm。

圖片



圖 1 龍門石窟賓陽北洞牛懿德造地藏菩薩像



圖 2 龍門石窟賓陽南洞李□靜造



圖 3 陝西彬縣大佛寺 Q163 號龕地藏菩薩像



圖 4 彬縣大佛寺 Q130 號龕地藏菩薩像



圖 5 河北南響堂山石窟第 1 洞長安□年造觀音、地藏像



圖 6 南響堂山石窟第 4 洞荆義振等造觀音、地藏像



圖 7 彬縣大佛寺 Q123 號龕李承基造出家菩薩像



圖 8 龍門石窟賓陽中洞上方五道地藏菩薩像

圖片來源：

圖 1、圖 2、圖 8：常青，〈龍門石窟地藏菩薩及其有關問題〉，《中原文物》4，頁 28-30。1993 年。

圖 3、圖 4、圖 7：常青，《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頁 167、156、152。北京：現代出版社。1998 年。

圖 5、圖 6：潘亮文，《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頁 55-56。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學院發行。1999 年。

Textual Research on Ti-tsang's Images in the period of 651-712 C.E.

Yin Fu

Associate Copy Edit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Journal Agency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general, there are four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tsang cult in China. The second stage, which is from 651 C.E. to 712 C.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period of 581-650 C.E., praying to Ti-tsang was a prevalent religious devotional practice; while in the period of 651-712 C.E., there were many Ti-tsang images erected. Not only were these images numerous, their styles and shapes were also varied. They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image creations of Ti-tsang. This work discusses the prevalence of the creation of Ti-tsang images and its cause. As well, the variant styles and the causes behind these creations are considered. Also discussed are the devotional practices reflected in the Record for Image-cre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651-712 C.E..

Keywords: the Ti-tsang cult; Ti-tsang's images; *the Record for Image-creations*; *Shih-lun ching*; San-chieh chiao school